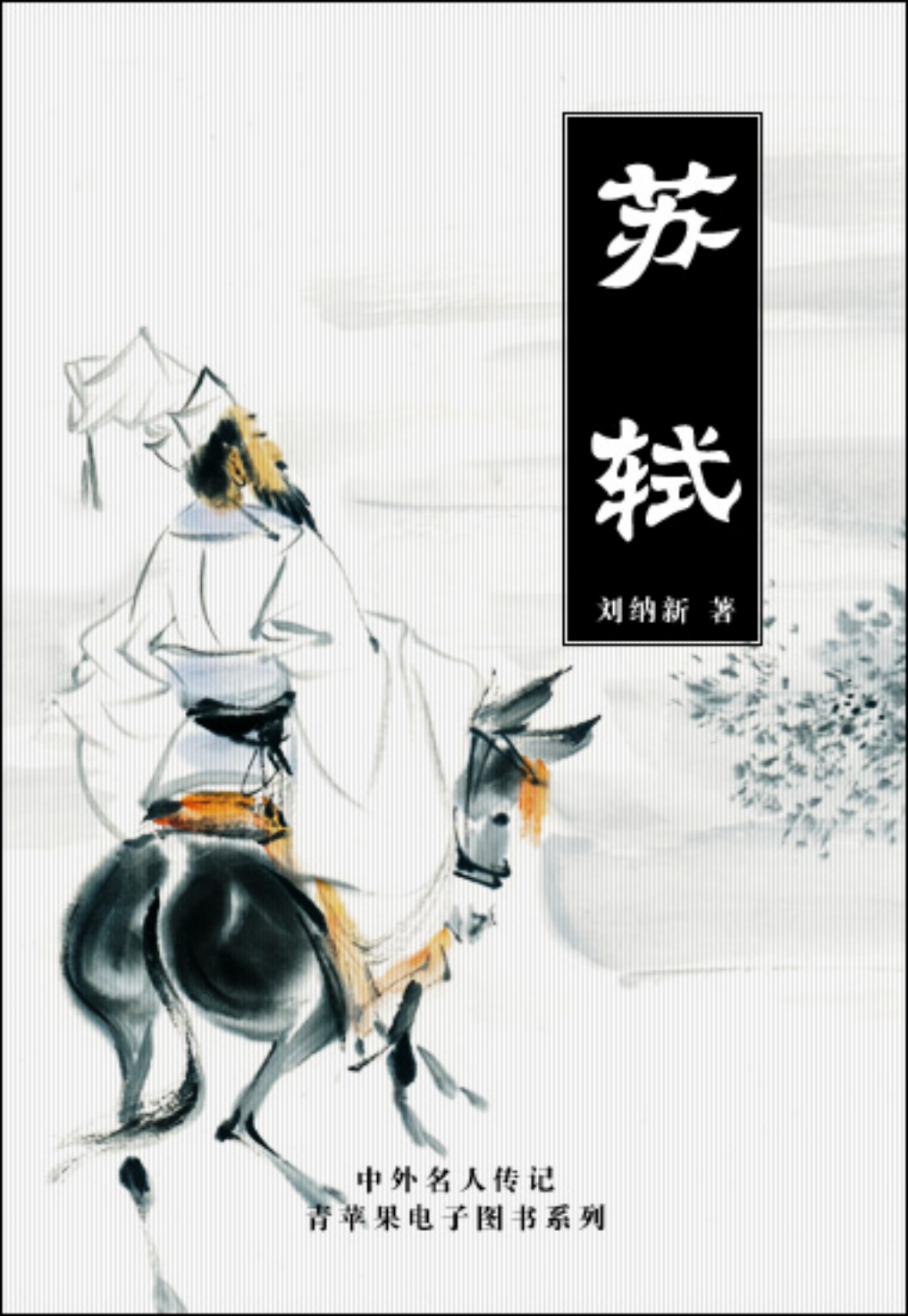




苏

轼

刘纳新 著

中外名人传记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苏 轼

刘纳新 编著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风华初露.....	3
第二章 卷入漩涡.....	9
第三章 诗词言志	22
第四章 黄楼乌台	41
第五章 东飘西荡	81

前言

中国历代名人中，提起“乌台诗案”，也许有十分之一的中国人能想到他；提到“唐宋八大家”，可能会有一半的人想到他；如果再念出“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等诗词锦句，只怕就会有八成以上的人脱口叫出他的名字；而若要再加上遍布全国的大小餐馆中，“东坡肘子”这天天被人念叨的菜名，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中国的诗人中——也不妨说中外诗人中，真正称得上在中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就只有苏轼（东坡）了？

苏轼一生，可谓坎坷，他因为不赞同王安石推行的新法，初入仕途即被外放。苏轼先后在浙江、山东、江苏、湖北和广东等地做过官，每到一处，他的诗文都陪伴着他。他的文字，抒发他的快乐，缓解他的悲哀，也给他惹来了许多麻烦。

苏轼是一位伟大的诗人，然而他又不仅仅是一位诗人。唐宋古文运动中，苏轼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他一改柔靡绮丽的词风，以广阔的内容和雄健的笔力扩大了词的领域，并提高了它的意境；苏轼并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书法上，然而他的字却被评为宋代第一；还有他的画、他对佛教的研究……苏轼比其他名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

感，近一千年来，每一代都有人真心喜欢他。

让我们回到过去，重走一遍九百多年前的路，试着了解一下这个伟大的灵魂……

第一章 风华初露

苏轼生于宋仁宗景佑三年（公元 1037 年），死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公元 1101 年）。苏轼死后二十五年，华北被金人攻占，北宋灭亡。苏轼在北宋五位皇帝手下做过官，他的才气被每一位皇帝称赞，可每一位皇帝都没有好好地任用过他。

苏轼的故乡在四川省眉山镇。眉山附近，有佛教胜地峨眉山，有雄伟壮观的乐山大佛，还有浩荡长江的支流——岷江。眉山山川秀丽，地杰人灵，至今这里的人们还会骄傲地对远方来客提起苏家——中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文学世家，以“三苏”并称。一个杰出的父亲（苏洵）养育了两个杰出的儿子（苏轼、苏辙），父子三人都名列“唐宋八大家”。

苏轼出生时，他父亲苏洵已经 27 岁。苏洵 20 岁时有过一个儿子，后来夭折了，所以苏轼成为家中的长男，他的生日是 12 月 29 日。

几乎所有的名人都会有一些小时候的故事流传下来，苏轼也是这样。

苏轼 6 时进学堂，因为聪明伶俐，他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8 岁到 10 岁间，他父亲进京赶考，落榜后也不回家，而

是去四处游历，于是，苏轼的母亲程氏在家担负起教导他的责任。小苏轼听到古往今来成败兴衰的历史故事，总是能概括地说出它们的要点。

一次，他母亲教他《后汉书》中的文章《范滂传》，范滂是后汉时的一位青年文人。后汉由于治理不当，政权落入宦官手中，以致全国贪污、贿赂、敛财和滥捕盛行，正直忠贞的学者们一再进谏，却因地方官都是宦官的门人和手下，招来一再的审讯。后来，许多文人被杀害，范滂就是其中之一。范滂临死前与母亲诀别，其母深明大义，范滂终于从容赴死。读完这篇书，小苏轼说：“我如果做范滂，母亲能允许吗？”他母亲说：“你能够做范滂，我反而不能做范滂母亲吗？”简短的对话中，苏轼的志向与苏轼母亲的正直可见一斑。

到 11 岁，苏轼开始大量阅读经书、史书、诗篇和选文，为进京赶考作准备。这期间，他的父亲也回来了。苏洵按照传统的方法教育儿子，经常让苏轼兄弟二人背诵古文给他听。当两个小孩子站在父亲面前背书时，他们都没想到，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三苏”，不久之后就将让历史永远记下他们的名字了：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他的弟弟苏辙，字子由，晚年自号“颖滨遗老”；他们的父亲苏洵，字明允，诗号老泉。

在苏轼一生中，和他最亲近的就是他弟弟子由。兄弟之间的友爱和坎坷中所表现的忠诚是他一生中最常歌颂的主题。他们悲哀中互相安慰，灾难中互相帮助，常常梦见彼此，也常写诗互赠。他们既是兄弟，又是师徒，更是朋友。苏轼在一首诗里说：“我少知子由，天资和且清。岂独为吾弟，更

是贤友生。”苏辙则在苏轼的墓志铭中写道：“我初从公，赖以有知。抚我则兄，诲我则师。”千百年来为人们反复吟唱，每到月圆之夜总会有人念起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这首词，也是苏轼兄弟情深的明证。

苏辙比苏轼冷静，二人为官后，苏辙常给他哥哥一些忠告。也许因为他不固执，也许因为他的文名与才名不如哥哥，政敌们觉得他不那么危险，所以苏辙虽然与苏轼政见相同，整个政治生涯也同起同落，可苏辙的官位始终比苏轼高。

苏轼还有一个姐姐，有关她的资料几乎没有，倒是中国民间的传奇都认定苏轼有一位充满才气的妹妹。传说认为她也是诗人，嫁给了名诗人兼苏轼的门生，另一位诗人秦少游。民间还盛传她新婚之夜考新郎，让他对对子，结果使新郎几乎一夜没能进入新房的故事；另外还有许多兄妹二人联对、互相开玩笑的故事。不过，人们找不出苏轼的妹妹存在的根据——苏轼兄弟的几百封书简和记载中经常提到秦少游，但都不存在联姻的迹象，当时学者所写的十余本传略中也不曾提到苏轼有位妹妹。再加上秦少游二十九岁时才初见苏轼，且不说当时他早已婚配，那时苏轼的妹妹算来也应有四十岁，二人怎么可能结亲呢？这众多的传说，该算是苏轼人格魅力的另一种体现吧。

苏轼兄弟一年年长大成人，他们的父母认为他们的学识和年龄都适合进京赶考了，于是，为兄弟二人办了婚事。

苏轼成亲时 18 岁，妻子王弗，刚 15 岁，四川省青神人；苏辙比苏轼晚一年结婚，是年 16 岁。

婚后，苏轼兄弟随父亲进京。

仁宗嘉佑元年（1056年）五月，三苏抵达京城，在京城住了几个月之后，嘉佑二年（1057年），苏轼兄弟参加礼部考试。当时主考官是欧阳修。参加考试是读书人一生最重大的时刻，充满了兴奋、渴望和患得患失的心情，多年的寒窗苦读就要见出成果了。应考人必须半夜起床，天亮就到皇宫，自备冷饭干粮，要到考完才能出来。考试进行中他们分别被关在隔开的小屋里，有宫中卫士看守。当局有一套严防贿赂或循私的制度，应考人的试卷都由书记重抄一遍，再交给考官，以免主考官看出笔迹。重抄的卷子不写姓名，另记在档案里。然后考官入禁宫中，不准和外面的人接触，通常从一月底关到三月初，把试卷批好呈给皇帝看。应考人先考历史或策论，第二回再考古文，待成绩揭晓，得中的人必须在皇帝监督下考诗赋和策问。

当时科举应试的文章中，割裂文辞、追求怪异的流弊占了上风，主考官欧阳修正思考用怎样的方法来挽救文风，看到苏轼的《刑赏忠厚论》，十分惊喜，想把这位考生选为第一名，可他怀疑这篇文章是他的门客曾巩写的，为了避嫌，他把文章放在第二名；后来苏轼又凭《春秋》对义得居第一；殿试他中了乙科。嘉佑二年（1057年）四月十四日，年方二十的苏轼被点为进士，得到这个荣誉就表示他立刻变成全国一流的学者了。

按照惯例，考试结束后苏轼写了名帖去拜见欧阳修，感激他的知遇之恩。欧阳修对同事梅圣俞说：“读苏轼的信，我欢喜之极，我应当设法退隐，给这个青年人出人头地的机会。”须知欧阳修是当时的文学权威，他的一句褒贬就可以造就或

毁灭一个文人。有位作家曾说，文士不怕刑罚，不爱晋升，也不贪生怕死，只怕欧阳修的意见。不难想见，欧阳修上面那句话一出，京师必然一片哗然，大多数人都表示不服，不过，慢慢地，他们都信服了。据说欧阳修还对儿子说过：“记住我的话，三十年后没有人会谈起我。”他的这个预言果然实现了，苏轼死后十年没有人提欧阳修，人人都在谈论苏轼，偷读他被禁的作品。

苏轼正要开始做官，他母亲去世了，他必须回家守丧。苏轼的姐姐几年前就死了，家里的男人都出去应考，母亲和两个媳妇留在家中，她临死前还没有听到京师的好消息。待父子三人匆匆赶回家，发现房子乱七八糟，篱笆倒塌，屋顶漏雨，“如逃亡之家”。

守丧期满，苏洵决定举家迁往京都，一家人由长江顺流而下，于嘉佑五年（1060年）二月抵达京都。

一路上，他们饱览了长江三峡的壮丽景色，苏轼兄弟沿途写了百首诗，都收在“南行”集里。

在京定居以后，苏轼兄弟又通过两次考试，一次考京师各部的任务，另一次更重要，考“制策”，公开批评朝政。仁宗皇帝求才若渴，下令举办这个特殊的考试，以鼓励公开批评的精神，一切文人都可以靠各部推荐或提出作品而报名。两兄弟在欧阳修推荐下报名，通过考试，苏轼的制策列入三等。从宋初以来，制策能列入三等的只有两人，苏轼即是其一，另一个人是吴育。苏轼还提出二十五篇史论，其中几篇至今仍是学校爱选的范文。后来仁宗皇后告诉别人，仁宗皇帝看过苏轼兄弟的文章后，曾高兴地说：“今日为子孙得二相才。”

此时的苏轼，年龄刚二十出头，夫妇恩爱，初为人父，学术和写作声誉一天天提高，诗文受到广泛的喜爱，可以说是一帆风顺了。他愉快、冲动、野心勃勃，随时准备着去施展自己的报负，用思想与行动去报效朝廷、造福百姓。

这里摘录苏轼早期作品中的一首诗，诗中已初露他精神世界的高逸。

日月何促促，尘世苦局束。
仙子去无踪，故山遗白鹿。
仙子已去鹿无家，孤栖怅望层城霞。
至今闻有游洞客，夜来江市叫平沙。
长松千树风萧瑟，仙宫去人无咫尺。
夜鸣白鹿安在兮，满山秋草无行迹。

第二章 卷入漩涡

嘉佑六年（1061 年）底，苏轼被任命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今属陕西）判官，有权签署报告和送往朝廷的通讯。

凤翔因为和甘肃南边的强邻西夏纠纷迭起，人力缺乏，民穷财尽。苏轼的职务没有太多工作，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此地为民求雨的事：有一年凤翔一带久不降雨，农民面临着收成不保的局面，苏轼与太守决定替百姓求雨。苏轼献上祈雨文，数以千计的人赶来共同祈祷，结果，果然接连下了几天大雨，缓解了旱情。苏轼非常高兴，为了纪念，他将官舍后面的亭子命名为“喜雨亭”，还写了一篇碑记。后来，苏轼在其他各地做官时，多次带领百姓去求雨，他每次求雨所做的祈文，都收在他的“全集”里。

仁宗皇帝嘉佑八年（1063 年）去世，新皇帝是英宗。英宗在治平元年（1064 年）免去苏轼的前职。他因为久闻苏轼大名，打算破例升他为翰林，担任替皇帝起草诏书的文书工作。当时的宰相韩琦说：“苏轼之才，是大器之才，以后自然被天下重用。重要的是朝廷要培养他，使天下的读书人没有一个不敬畏、羡慕、心服他，然后才选取他、任用他，那么就不会有人持不同的意见了。如果现在就骤然重用他，那么

天下的读书人未必以为这是对的，皇上这样做，反而会连累他。”英宗说：“那么就给他一个修注怎么样？”韩琦说：“记注和制诰是相近的工作，不可贸然任命。不如在馆阁中选择一个能够接近皇上的贴职给他，而且请皇上先召他来面试一下。”英宗说：“我们不知道一个人的真才实学，才需要考试。何必考苏轼呢？”但韩琦仍然坚持，于是考苏轼二论，他又列入第三等，可以任职史馆。苏轼听到韩琦的这些话后，说：“韩公真可说是用德来爱护人才了。”史馆的官吏轮流在皇家图书馆工作，苏轼有机会看到皇家收藏的珍本、手稿和名画，心里很高兴。

治平二年（1065年）五月，苏轼的妻子王弗去世，年方二十六岁。她给苏轼留下了一个六岁的儿子苏迈。王弗对苏轼温柔贤惠，俩人恩爱情深，她的去世，对苏轼精神上是一次很大的打击。王弗死后十年，一夜，苏轼又梦到爱妻，醒转后满怀愁绪，写下这首千古传诵的悼亡词。

江城子

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
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
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
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肠断处：
明月夜，短松冈。

妻子夭亡，苏轼还没从丧妻之痛中走出，第二年即治平三年（1066 年）四月，他的父亲又去世了。

苏轼兄弟辞官返回眉山，埋葬了王弗和苏洵后，他们又要为父亲守服二十七个月。

丧期届满，苏轼再婚，他的第二任太太是王弗的堂妹王闰之。

这期间神宗即位。

神宗熙宁二年（1069 年），苏轼兄弟重返京师，从此卷入政治风暴之中。

在此，有必要将王安石作一介绍。王安石（1021——1086 年），字介甫，北宋临川（今江西省抚州市）人，诗词散文俱佳，思想创新，有口才。神宗起用他做了宰相，在职期间，王安石积极推行新法，革新政治，以缓和当时政治、经济的危机，因种种原因，其新法最终失败。王安石既是一位诗人，又是一位政治家，在政治上，他以雄才大略、执拗果断著称于史册，他死后，民间称他“拗相公”，可见其性情之顽固。苏轼曾评王安石是“三不足”——“天命不足畏，众言不足从，祖宗之法不足用”。

苏轼于熙宁二年（1069 年）重返朝廷时，王安石正做宰

相。王安石平时就讨厌苏轼政见和自己不同，于是就让苏轼判官告院。熙宁四年（1071年），王安石想改变科举、兴建学校，诏两制、三馆讨论。苏轼上书议论说：

“求得人才的途径，在于了解人才；了解人才的办法，在于求其实。假如国君和宰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求实之政，那么胥史皂隶中未尝没有人才，何况在学校和贡举中呢？即使沿袭目前的做法，我认为人才仍会有余。假如国君和宰相不了解人，朝廷不去求实，那么即使在公卿侍从之中也常常会担心没有人才，何况在学校和贡举中呢？即使恢复了古代的学校制度，我认为人才还是会不足的。时代有好或坏，事物有废和兴，当时代安定，即使暴君也不能废毁它，等到它已是倾颓的时候，就是圣人也无法恢复它。所以风俗变化了，法律和制度也要跟着变。就像大江大河的改道，要勉强它恢复原来的样子，是很难的。

“庆历年间本来曾经建立过学校，但是到了今天，只有空名还存在着。现在要改变今天的礼制，变更今天的风俗，又要征发民力来整修官室，聚敛百姓的财富来供养那些游士。百里之内设置官府建立军队，狱讼在那里治理，军务在那里谋划，又要精简那些不受统领的官员，把他们摒弃到远方，那不是人为地制造纷乱，给天下人民造成苦难吗？如果没有多大的改革而又希望对时代有益，那么和庆历年间的建立学校又有什么不同呢？所以我认为今天的学校，尤其应该沿用过去的制度，让先王所创的旧业，不至于在我们这一代被废弃就够了。至于贡举这种办法，已经施行百年了，国家的治乱盛衰，原因并不是因为贡举。皇上看祖宗的时代，贡举这办

法，和今天相比究竟是哪个好？言语和文章，和今天相比究竟哪个优？得到的人才，和今天相比究竟哪个多？天下的事情，和今天相比究竟谁会办？比较了这四件事的长短，就可以对议论作出决定了。

“现在想改变的不过是几桩小事：有人说乡举应该以德行为本而略去文辞；有人说应该专取策论而免去诗赋；有人却希望兼采名誉声望而废除糊名弥封的考试办法；有人则希望经生不考帖经而考大义，这些都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的论调啊。希望皇上能注意长远的、大的事情，而小小的变法又何必去干预呢？我还有一个经常挂在心上的私忧，也许只是错误的想法，但还是想对皇上陈说：关于性命的学说，从子贡开始都没有听到过夫子的阐释，而今天的学者，却偏偏把不谈性命看成可耻的事。读他们的文章，感到大而无当而难以穷尽；看他们的样子，似乎超然物外无所黏着而不可留取，这难道算是真有才能吗？原来那些只有中等资质的人，却偏偏在那里安于放任，乐于荒诞罢了。皇上又为什么要用他们呢？”

苏轼将奏议呈上，神宗醒悟了，说：“我原来就怀疑这个改革，读了苏轼的奏议，思想就完全清楚了。”神宗当天就召见了苏轼，问：“目前朝廷政事、法令的得与失都有些什么呢？你只管告诉我，即使是我的错，也请你明言。”苏轼回答道：“皇上有生来就明理的天性。治国之道，不怕不明，不怕不勤，不怕不果断，就怕求治心太急，听的意见太泛，进用的人才过快过多。希望皇上能用安静来镇住急躁，静等着变化的自然到来。然后适应它就是了。”神宗恍然大悟，心有余悸地说：“你这几句话，我应该牢牢记住，好好思量。你在馆阁工

作，希望能替我好好考虑治乱的措施，不要有什么隐瞒。”苏轼退出后，就把神宗的话告诉了其他同事。王安石心里十分不快，就想了个办法，让苏轼任开封府推官，打算让繁忙的政事束缚住苏轼。谁知苏轼处理政务果断、精确、敏捷，结果王安石此举反而让苏轼的名声传播得更快更远了。

一年元宵佳节将临时，朝廷下令开封府到浙江去买彩灯，并且命令要压低收购价格。苏轼上书说：“皇上难道会把元宵观灯作为快乐吗？其实这不过是想侍奉皇后和太后，讨她们的欢心罢了！然而皇上的这份心，百姓是不会知道的。以低价从他们手中买灯，他们会认为皇上是为了自己的享乐，去夺取他们的口中食身上衣！这件事本来很小很小，但它牵涉的事体却很大，请皇上收回成命。”神宗于是下诏取消了此事。从这件小事上，我们可以看出，神宗的确对苏轼的意见是很尊重的。

但是我们说过王安石是个口才绝佳的人，他深得神宗信任和宠爱，还获得了高官。在熙宁三年（1070年），王安石开始全面整肃御史，反对新法的官员一个个被罢官或者被远调，这样，朝廷的官员越来越多地成为王安石的亲信与支持者。苏轼本来还算安全，王安石并没有要对付他的意思，可苏轼却主动出击，向皇帝呈上了“上皇帝书”，洋洋洒洒九千字，力述新法的不利。

苏轼的“上皇帝书”，可以说代表了他的政治哲学，也显出他个人的脾气和文风，整篇文章充满了机智、学问和大无畏的勇气，义愤的争论中夹着冷静、简明的推理。有时文笔犀利，直爽无比；有时徐徐道来，引经据典。文章内容巧妙、

诚挚、有力，对世事满怀激情和悲哀。苏轼明知此时上书对自己非常不利，照情形看，他至少也会被免职，可苏轼想到神宗曾说过让他“好好考虑治乱措施，不要有什么隐瞒”，觉得自己有必要在关键时刻表明立场。

“上皇帝书”中，重要的论点有两个，第一是“君权民授”的观点，这是孟子的观点，他说，君主并不是靠“神”给予的权利来治理国家，而是依靠“民”——百姓的支持！另一个论点是有关容纳不同意见和批评的问题。当时王安石清除台谏——“台谏”是一个组织，其功能是代表公众的意见，不断检讨批评当权者的不足——引起大批官员的不满。

苏轼写道：“我想说的话，只有三句：希望皇上能结人心，厚风俗，存法度。君主所依靠的，就是人心，这就像树木依赖于树根，灯儿要亮就依赖于灯油，就像鱼依赖于水，就像农夫的生存依赖于土地，就像做生意的人离不了货币。树木没有根就会干枯，灯没有灯油就会灭掉，鱼失去水就会死亡，农夫失去田地就会挨饿，商人没有钱财就会贫穷，同样，君主失去了人心，他的统治便会灭亡，这是必然的道理。自古以来，没有一个平和、简易、随俗、同众的君主治理的国家是不安定的，也没有一个刚愎自用的君主治理的国家是不危险的。”

苏轼认为，好的朝廷要靠不同意见的健全作用来维持，民主就存在于各种不同的观点之中。他例举出历史上有名的贤君，说他们都是喜欢听取不同意见，用以完善自己的决定的。苏轼还指出，当时商业瘫痪，物价高涨，近到京师四周的省份，远至川蜀地带，到处都是谣言，民心十分不稳，而这一

切都是因为朝廷的新法。他说：

“从历代皇上起，理财的一直是三司。现在皇上却不让三司理财，无故又创设制置‘三司条例’一司，让六七十个年轻人，日夜在里面空自议论，又让四十多个使者分别到全国各地去推行此法。设置‘三司条例’这个司，不过是为求利而新设的一个名称；六七十个年轻人和四十余名使者，也不过是些求利的工具。这一举措，开端的声势很宏大，百姓却惶惑不安；创立的法式很新奇，官吏们却不明所以。……把鱼网撒入江湖，对人却说：‘我不是为了捕鱼’，还不如丢掉鱼网，别人自然信服。驱逐鹰犬奔赴丛林，对人却说：‘我不是在打猎’，还不如遣散鹰犬。所以我认为要消除邪恶的谗言，平息人们不安的议论，带来和气，不如撤除条例司。

“现在君臣勤于政务，快一年了，而其功效，却茫茫然犹如要用手捕捉风，只听说内库拿出了数百万缗钱，祠部投入了五千多人罢了。如果这叫改革，那用这样的方法进行改革，又有谁不会呢？……

苏轼说他相信皇上可以明显看出国内的不和与斗争，并且提醒皇帝新法已失去民心，再坚持下去是很不合适的。他说：

“先皇委任了谏院的官员以后，就没有开罪过一个言官。即使有轻微的责任，随即也就越级提升了他们，允许他们根据风闻就议论朝政，而不必顾及官长。如果议论中涉及到皇帝，那么皇帝就会神色不悦；如果议论中涉及朝廷，那么宰相就会担心受处分。参加台谏的人本来未必都是贤人，他们所说的话也未必都正确，然而一定要培养我们的锐气，之所

以给他们以重权，难道是白白地这样做的吗？——是想用他们的权力不让奸臣萌生啊！现在法令严密，朝廷也很清明，说有奸臣，是万万没有这个道理的。然而养猫本来是为了灭鼠，不可以因为没有老鼠就养不捉鼠的猫；养狗本来是为了防盗，不能因为没有盗贼就饲养不叫的狗。皇上你能够上不念祖宗创设谏官的原意，下不为子孙万世设防吗？我听那些德高望重的长老们谈论，都说谏官们的言论，常常是根据天下人的公议而发的。公众的议论是赞美的，台谏也就赞美；公众的议论是抨击的，台谏也就抨击。现在公众的议论沸腾，怨言交互而来，公众的意见所在，也就不得而知了。我担心从此以后，习惯成风，都成了宰相的私人，以至皇上孤立。朝廷的法度一旦废弛，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呢？我之所以希望皇上保存法度的道理，正在于这里啊！”

神宗对苏轼的陈述没有作出反应，于是苏轼又上了一书，这时正好皇帝下令禁止强摊贷款，可他并不打算废新政。苏轼于是引用孟子的话，说这就像个偷鸡贼，说是有心改过，但却仍要偷鸡，只不过，把一天偷一只改成一个月偷一只而已。

苏轼看到王安石用“独断专任”来赞美神宗，就借考试进士策问的机会，对王安石进行讥讽。王安石大怒，苏轼被免职，王安石还让自己的亲戚兼随从谢景温弹劾苏轼，说他护送父亲的棺木回四川时，曾滥用政府的卫兵，买家具、陶瓷，甚至贩卖私盐谋利。朝廷派了官员到苏轼途经的省份，向船夫、士兵收集资料，结果却一无所获。

按作官的成绩考核，苏轼应该可以担任太守职务，皇帝也想如此，可皇帝的想法受到王安石和谢景温的反对，他们

希望派苏轼去边远城市作判官，最后，皇帝决定派苏轼到丽都杭州作判官。这算是一种折衷，官职虽然是小，可毕竟杭州是个不错的城市。

苏轼正要离京，京城里发生了暴乱。朝廷从前一年的冬天开始实行保甲法，因为士兵们在京城附近的村里练兵，村民们怀疑政府会派他们也去前线打仗，加上朝廷又让他们上交家中的军备，如弓箭之类的，所以村民们就示威抗议。村庄里一遍混乱，村民们甚至自己弄折手腕、割掉指头，以逃避被征兵。

这次暴乱很快平息，苏轼没有改变自己的计划，熙宁四年（1071年）七月，他带领家人离开京师，到美丽的城市杭州去任职了。

这里有必要先讲一下王安石变法的后事。熙宁六年（1073年），“圣山”华山发生土崩，皇帝惊慌失措——因为所有的皇帝都认为自己称皇是上天的旨意，所以他们都迷信，自然界中发生的一切，他们都会联想到这是上天在给他们发布某种信息——于是搬到另一座宫殿居住，同时改吃粗陋的食粮，以示尊敬上苍。碰巧，熙宁六年（1073年）夏天到熙宁七年（1074年）春天久旱不雨。这令皇帝十分担心，又不知如何是好，于是，他去问王安石，王安石说：“水灾、旱灾都是天灾，最贤明的君王当政时的尧舜时代也有水旱灾害，不必担心，我们只要继续行善政就行了。”

“我怕的就是这一点，”皇帝忧虑地说，“怕我们行的不是善政。我听到不少人埋怨新政中的商税法规，连太后和皇后，甚至也听到不少这些议论。”

当时另一位大臣冯京也在场，他插话道：“我也听说了。”

王安石说：“冯京听到怨言，是因为不满的人都涌在他身边吧，我怎么一句这类的话也没听到呢。”

皇上没有再说什么，不过心里肯定是无法平静的。

此刻一个职位卑小的官员出场了，他在这次变动中担任了重任，他就是画灾民图的“安上门”小吏郑侠。郑侠画了一卷灾民拴着铁链砍树、赚钱还公债的画轴，还附了一张短笺，一齐献给皇帝。

短笺上写道：“窃闻南征北伐者，皆以其胜捷之势，山川之形，为图来献。料无一个以天下之民质妻鬻子，斩桑坏舍，流离逃散，皇皇不给之状，图以上闻者。臣谨按安上门逐日所见，绘成一图。百不及一，但经圣览，亦可流涕。况乎千万里之外，有甚于此哉！陛下观臣之图，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郑侠上对。”

郑侠在短笺中说皇帝如果相信他的话，并肯改变新法，十天之内肯定会下雨，否则，他说他愿意被杀头！也许是这些话让皇帝震惊，也许是那些图让皇帝对百姓产生了恻隐之心，皇帝把这卷画轴带回寝宫给太后和皇后看。

太后先开口道：“听说新法中的助役金和青苗款害苦了人民。我想我们是不该改变祖先的法制的。”

“新法造福百姓，不是压迫他们。”皇帝说。

“我知道王安石才略不凡，”太后说，“但他树敌太多。为了他好，我认为你可以考虑将他停职。”

皇帝说：“可我发现大臣中只有王安石肯当大任。”

神宗的弟弟岐王正好站在旁边，他说：“我认为你该考虑

祖母的训示。”

皇帝生气地说：“好，好，我不会治国。那你来吧！”

“我并不是这个意思，”岐王说。

大家沉默了好一会儿，太后最后说：“王安石惹了大麻烦，你总该有个打算吧？”

第二天，皇帝免去王安石的职位，他还决心废除商税、青苗、助役钱、保甲法和方田均税等十八项措施。

天果然下起雨来！

不过王安石最后的时刻还没到来。依法规郑侠遭到弹劾——他起初按规矩献图，可宫中官吏不肯接，说他是小官，没资格和皇帝通讯，郑侠就想了个办法，到京师城外的官差站，告诉差人说有紧急军报，叫他快马送入宫内。由于非法利用官差，御史们审问了郑侠。

史书没有记载审讯的结果，但记载有另一件事：次年一月郑侠又献了一册“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业图”给皇上。图中画的是唐朝几个有名的忠臣和奸臣，虽然没有直接提到现在的政府，前朝奸相的故事却和如今当权的人十分相像。就算含意不明显，图中的传奇故事也点明了一切。因为王安石已经罢相，郑侠除了图册，还上了一道奏折，推荐了一位忠臣做宰相。

王安石上任后，反对他的人都被他设法弄走了，朝廷剩下的都是他的拥护者，虽然现在王安石被罢了官，朝内他的党羽的力量仍然强大，所以，郑侠被判了死刑，多亏皇帝阻止说：“郑侠顾国不顾身，我佩服他的勇气和正义，不能重罚。”于是郑侠才免于一死，被贬去英州。

熙宁八年（1075 年）二月，王安石再次被任命为宰相，这次他没能再做出什么大事。朝廷中王安石原来的忠心不贰的追随者吕惠卿，在王安石罢官期间，成了朝廷官员中的领袖，但他被他的反对者弄垮了台，王安石复任后，因为惠卿在他处境困难时落井下石地罢免了他弟弟，所以他不可能再帮助惠卿。惠卿失去了希望，一边待审，一边对王安石发起最后攻击——他把这些年王安石给他写的一些私人信函上交给皇帝，说王安石不忠，因为好几封信上都有“别让皇上知道”的字样，皇帝看了这些信，才真正从内心里对王安石生出不满。

不久，王安石的儿子王雱身上长了个疮，王安石请来和尚、大夫诊治，却终于无效，他只好看着自己的儿子死去。王安石一生信佛，儿子的死令他有了某种顿悟，于是，熙宁九年（1076 年）十月，他申请辞职获得批准后，终于彻底离开了朝廷，离开了他曾抱有满怀希望的新法，把自己的一生功过，留给了后人们去争议。

第三章 诗词言志

被朝廷派往杭州作通判，这对被党争的政治漩涡搅得不胜其烦的苏轼来说，无异于是一种精神上的解脱。杭州的湖光山色，市民与同僚对他的尊敬，僧人与歌妓对他的崇拜，都使他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和愉快。续娶的年轻妻子和呀呀学语的儿女也使他感到惬意和温暖，杭州真的成了他的人间天堂。在此后的八九年间，苏轼分别在杭州、青岛附近的密州和江苏的徐州服务，政绩良好，这期间也是他写诗最活跃的时期，写了不少优美的诗词、哀歌、幽默诗和愤怒诗。他天真、自由，把心中的感慨直言不讳，以至后来他的诗词给他带来了大祸，这是后话。

苏轼将去杭州赴任时，苏辙正在陈州任职。陈州离京师东南七八十里，在苏轼的行程范围内，苏轼正好趁此机会多与弟弟相聚，他在那儿住了七十多天，从七月一直住到过完了中秋节。他们的老朋友，曾在成都任职的张方平当时也住在陈州，大家经常一块儿饮酒作诗。

苏辙很穷，一大家人住在一栋低矮的小房子里，苏轼常拿弟弟的身高开玩笑：“常时低头诵经史，忽然欠伸屋打头。”

家人闲居团圆了两个多月，兄弟俩常到柳湖去划船，或

者到城郊去散步，讨论国家的政局。苏辙劝告苏轼，苏轼最大的缺点就是喜欢在宾客面前或者作品中坦白说出他的看法，苏辙十分了解他的哥哥，他把手放在嘴上，希望苏轼能沉默些，后来苏轼入狱，他也做过同样的手势。

两兄弟脾气和长像都不一样，苏辙个子较高，面孔圆润些，苏轼比较结实，骨肉均匀，面孔很大，颧骨高耸，前额突出，眼睛长而明亮，下颏匀称，留着潇洒、尖长的胡须，最动人的是他敏感、活泼、有力的双唇。这是一张充满人性温暖光辉的面孔，他的表情也许会由热烈的嬉笑迅速转成心事重重的沉思。

苏轼很明白自己性格中的一些特点，“我知道”，他对弟弟说，“我常常口没遮拦。我觉得某一件事不对，就会像在饭菜中发现一只苍蝇，非吐出来不可。”

“不过你先得认清谈话的对象，”他弟弟说，“有些人值得信赖，有些人却不行。”

“这就是我的弱点，”苏轼同意说，“也许我天生太相信别人。不管和谁说话，我都喜欢倾吐内心的秘密。”

他告诉弟弟说，他上表给皇帝，心里倒真是为自己的性命担忧。他说有一个朋友也很担心，那就是晁端彦。晁端彦是苏轼的“同年”，二人同一年考中进士。

“不过我告诉晁同年，我曾通过仁宗皇帝的特别考试，”苏轼又说，“我才立刻被大官们当作朋友。仁宗皇帝曾接受我的谏言，现在我不来说话，谁来说呢？我告诉他我真是怕会死，他没有说话，表情很严肃。之后我又说，‘不过没关系，皇上杀我，我死而无悔。但有一点，坏了我，好了你，我才不干

呢。’”兄弟二人笑起来。

苏辙曾对哥哥说：“你有没有注意到，一天赋闲似乎等于平常的两天？因此，一个人若活了七十岁而能够整天悠悠闲闲，他实际上就活了一百四十岁。这是长寿的简便办法。”

两兄弟政治观点始终相同，立场也一致，但是性格却完全不一样。苏辙安稳，保守，不多说话；苏轼豪放，开朗，心直口快，不计后果。朋友同伴都觉得苏辙可靠，而苏轼开朗的天性，他的嘲弄和恶作剧却常令人害怕。

中秋之后，苏辙送哥哥到河流下游七十里的颍州（现在的阜阳），他们又在那儿过了两星期，有老师欧阳修为伴。

苏轼在一首诗中曾经写过“我生如飞蓬”这句话，的确，这真可以说是他一生最恰当的象征，从去杭州赴任开始，苏轼不停辗转，直到老死也没在一个地方住过三年以上。

当时的杭州已被称为“人间天堂”，这是苏轼的第二故乡，他一来杭州就写道：

“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

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

这里是他的第二故乡，不只因为此地有美丽的山丘、森林、湖泊、大海、热闹的市街、壮观的寺庙，也因为当地人民都很喜欢他，他度过了这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这里有南方人快乐的天性，有诗歌有美人，人们敬爱这位年轻的名诗人，欣赏他冲动、热情和无忧无虑的个性。美景启发他的灵感，此处柔婉的魅力更抚慰了他的心灵。杭州赢得他的青睐，他也赢得杭州人民的爱戴。他所担任的官职，使他没有机会为人民多尽力，但他诗人的身份已足以令人民喜欢他。他被

捕的时候，杭州人纷纷在街上设龛拜祭，替他解灾。他走了以后，南国的美景和温情一直令他魂牵梦萦。他十八年后再回杭州任太守，对本城建树极多，在杭州人心目中留下了不朽的回忆。现在的杭州人甚至不承认苏轼是四川人！

苏轼的心情，漂泊的魅力，爱情和欢乐都与西湖百分之百连结在一起，该地的诗情和他的作品互相找到了最好的发挥。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短短的四行诗，可以说代表了西湖所有的景色与变化。这首诗，成了公认最好的咏西湖诗。

苏轼在杭州三年，无日不在山水之间，他甚至连诉讼决案等公务也在西湖办理。随着政治上的日益不得志，他对杭州的这种深情也与日俱增。

“山与歌眉敛，波同醉眼流。

游人都上十三楼。

不羡竹西歌吹古扬州。

菰黍连昌薺，琼彝倒玉舟。

谁家水调唱歌头。

声绕碧山飞去晚云留。”

这首《南歌子》词，写的是宋时杭州的名胜十三楼。十三楼是临近西湖的一个风景点，“游人都上十三楼”，意即凡是来游西湖的人，没有不上十三楼的。此词以写十三楼为中心，但并没有将这一名胜的景物作细致刻画，而是用写意的

笔法，着意描绘听歌、饮酒等雅兴豪举，烘托出一种大自然同化的精神境界，给人一种飘然欲仙的愉悦之感。词中巧妙地运用对比手法，将古扬州的竹亭与十三楼对比，省却许多笔墨，却增添了强烈的艺术效果。另外，词中还利用“移情”来起突出作用，作者利用歌眉与远山，目光与水波的相似，赋予远山和水波以人的感情，创造出“山与歌眉敛，波同醉眼流”的迷人的艺术佳境。晚云为歌声而留步，也是一种移情，耐人品味。

在杭州，苏轼经常与同事们一起，在西湖或附近的风景区游览，一般情况下，他们会带歌妓同行。据说，有一次府僚们在西湖宴集，官妓秀兰因刚沐浴后困倦，醒后赶去时已经迟到，她折了一枝石榴花陪罪，苏轼就作了一首词，令秀兰唱着，为他们助兴。这首词既写了美人的心事，又说到石榴花的外形，还将美丽的女主人公对爱情的忠贞，与石榴花紧束的花瓣结合在一起，体现了作者高超的写作技巧。

乳燕飞华屋，
悄无人、桐阴转午，晚凉新浴。
手弄生绡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
渐困倚、孤眠清熟。
帘外谁来推绣户？
枉教人梦断瑶台曲。
又却是、风敲竹。

石榴半吐红巾蹙，

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
秾艳一枝细看取，
芳心千重似束。
又恐被、西风惊绿。
若待得君来向此，
花前对酒不忍触。
共粉泪、两簇簇。

后人见到苏轼这一首词，认为并非为一名歌妓所写，而是写苏轼自己情怀的。有人评论说：“东坡此词，冠绝今古，托意高远，宁为一娼而发耶！”词中美人的“瑶台梦”一节，似隐隐寓含着“君臣遇合”和超然物外两种境界，而这正是苏轼性格中的两种主要特质。苏轼仕途多舛，壮志难酬，而年华如水，报国无门，这首词，或许真是他借佳人失时之态，寄政治失意之感吧？

杭州是苏轼理想的“人间天堂”，以至每一次因公事而暂时离开他都会恋恋不舍。熙宁六年（1073年）冬天，他被两浙转运使派往常州、润州等地赈济灾民，直到第二年入夏才回杭州，这是他离开杭州时间最长的一次，眷念之情自然更为深切。在润州时，他曾写过一首词，借思妇想念行役在外的丈夫的口吻来表达自己的思归之情。

去年相送，余杭门外，
飞雪似杨花。
今年春尽，杨花似雪，

犹不见还家。

对酒卷帘邀明月，风露透窗纱。

恰似姮娥怜双燕，

分明照、画梁斜。

这首词的成功集中在两处：一是利用雪与杨花形状相似，却代表着两种不同节候的特点，互为比喻，一可以形象地表示气候由极冷到极暖，历时长久；二可以构成洁白迷蒙的景象，象征着纯真而纷乱的情思。雪与杨花互喻，既有感情上的深度，又有形象上的美感。二是构思新巧别致。从双栖燕映衬出孤单的人已是一种纤巧的联想，而把月光照在梁上的燕巢上，看作是月中嫦娥只垂爱于成双成对的飞燕，而不顾惜空闺独守的人，就更是一种绮思妙想了，从表现力讲，这远胜于大段的内心独白。

苏轼喜欢杭州的美景，可对他的工作却是衷心地讨厌，他在会审讼案的时候，知道被捕的人大都是违犯新政法律的小民，而他根本就不赞成新法。不过法律已定，他无法更改，于是他通过诗词或给朋友的信件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就是这些文字，后来使他惹上破坏政府威信的名。

因为对手头工作的厌烦，苏轼就更彻底地逃入大自然的怀抱，他生性喜欢旅游，常常一个人在山间闲逛，到人迹稀少的高山顶或水源地赋诗。他常常游庙，与和尚们交朋友，在民间有很多他与和尚佛印的逸事。

传说有一天苏轼和佛印去参观一座庙宇，在前殿他们见

到哼哈二将。

“这两个神，哪一个更重要？”苏轼问。

“当然是拳头大的人重要。”佛印说。

他们走入内殿，见到手持念珠的观音菩萨，苏轼又提出一个问题：

“观音也是菩萨，她数念珠干什么？”

佛印说：“她也学别人拜佛呀。”

“拜哪一个菩萨呢？”苏轼又问。

“还是拜观世音呀！”

“这是怎么回事？她是观音菩萨，还要拜观音菩萨！”

佛印说：“咦，你难道不知道？求人不如求己嘛。”

有一次，佛印禅师将要登坛说法，苏轼闻讯赶去，但席中已无空位，佛印便对苏轼说：“人都坐满了，此间已无学士坐处。”苏轼以机锋相答：“既无坐处，我就以禅师四大五蕴身为座。”佛印见苏轼与他论禅，便说：“我有一个问题问你，如果你回答得出来，那么你就把我的身体当作你的座位，若回答不出，就请你把身上的玉带留下来。”苏轼欣然答应。佛印便道：“四大本空，五蕴非有，请问学士要坐在哪里？”苏轼一时语塞，只好把玉带留下。后来，佛印还作过一偈，为此事作纪念：“石霜夺取裴休笏，三百年来众口夸；争似苏公留玉带，长和明月共无瑕。”

还有一次，苏轼打算去拜访佛印，就事先写信给佛印，要佛印像赵州禅师迎接赵王那样迎接他。赵州禅师迎赵王是禅史上一段有名的故事，据传赵王很尊崇赵州禅师，便上山参拜，禅师不但没出门迎接，而且睡在床上不起来，还对赵王

说：“对不起，出家人素食，力气不足，加之我已年老，所以睡在床上见你。”赵王并没有为此责怪禅师，回去后反而派人送礼给禅师，禅师闻讯，连忙从床上起来，披上袈裟，到门口去迎接。门人对禅师此举感到莫名其妙，便问禅师：“刚才赵王来时，你睡在床上接待他，他的部下来了，你反而去门口迎接，这是什么道理？”赵州禅师说：“你们不懂，我接待上宾是躺在床上，以本来面目相见；次一等客人，就坐起来相见；再次一等客人，就取世俗的礼仪出门迎接。”苏轼要佛印如赵州禅师接赵王那样迎接他，就是要佛印以不接而接的上宾之礼迎接。但是，当苏轼快到寺院时，老远就看到佛印在门口站着，苏轼便嘲笑佛印不如赵州禅师道行高远，佛印回敬了一偈，说：“赵州当日少谦光，不出山门见赵王；争似金山无量相，大千都是一禅床。”意思是说赵州禅师不起床，是不谦恭而非道行高远，而我到门口来接你亦非离开禅床，因为整个大千世界都是禅床，此答使苏轼很是叹服。

苏轼涉足佛教时间很长，交游的和尚多，受影响也大。清代学者钱谦益曾说：“北宋以后，文之通释教者，以子瞻为极则。”从有关材料看，苏轼早年就开始接触佛教，这和他父母都信佛有关。苏轼的父母去世之后，苏轼将他们爱好的遗物施给佛寺。成年之后，苏轼便直接与佛教发生关系。在《王大年哀辞》中，他说：“嘉佑末，予从事岐下，而太原王君讳彭字大年监府诸军……，予始未知佛法，君为言大略，皆推见至隐以自证耳，使人不疑。予之喜佛书，盖自君发之。”如果说苏轼早年主要受家庭佛教思想氛围之熏陶，那么，自结识王大年并从之习佛后，他便走上自觉“好佛”之道路了。起

初，苏轼推崇摩诃居士，后来，他遍游大山名寺，“三百六十寺，处处题清诗”，广交名僧大德。苏轼所结交的僧人中，以诗僧、禅师为多，交谊也最深。尤其到了晚年，他对禅表现出特别的兴趣，所谓“久参白足知禅味”，说明他既好参禅又“知禅味”，并常常把这种“禅味”融入诗中，写出了许多富有佛理的传世佳句，诸如“溪声尽是广长舌，山色无非清静身”，“回头自笑风波地，闭眼聊观梦幻身”，等等。

苏轼在江北瓜洲任职时，和佛印所住之金山寺只有一江之隔，那时苏轼十分自负，对禅亦然。有一天他作了一偈，曰：“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意思是说自己的禅定功夫很深，已不为世俗之称、讥讽、攻击、荣誉、利益、衰老、苦乐等所动，之后苏轼派人把偈子送给佛印。佛印看后，在上面批了两个字：“放屁！”就让人把偈子送回去。苏轼看到佛印的批语后，无名火顿起，立即乘船过江来找佛印。一到南岸，佛印已经在江边迎候他。苏轼大声责问佛印，为何以秽语来说他？佛印故意装作若无其事，并说：“我骂你什么了呀？”苏轼于是说起批语“放屁”的事，佛印听后呵呵大笑，说：“你不是‘八风吹不动’吗？怎么竟被一个‘屁’就打过江来了呢？！”苏轼听后大感自愧不如。

正是这样，在一次次与禅师们的交往中，苏轼一步步更接近了“知禅味”的境界。

能否“知禅味”，是与个人的悟性、修养和性格都有关的，说到这儿，又可以想到一件同样与这几样都有关的事：书法。

俗语说“见字知人”，苏轼作为一个思想开朗豪放的大诗人，他的才思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谨小慎微、循规

蹈矩，或句句皆有所本，对他来讲都是很不适合的。他的书法淋漓纵横，如行云流水，也是不择地而出，他说：“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所以，他的书法是一种痛快、博大、奔放、新颖、优美的艺术。有人嫌他过于“烂漫”，诚然，蓓蕾般含苞待放是一种很好的艺术风格，但是，山花烂漫、娇艳盛开，也不可谓不美。苏轼的儿子苏过说他父亲的书法：“岂以书自名哉，特以其至大至刚之气，发于胸中而应之以手，故不见其有刻画妩媚之态，而端乎章甫，若有不可犯之色。”即既有礼仪而又气势非凡。章甫是朝廷上或宗庙里戴的礼帽。苏轼是儒、道、禅三种思想都有所接受的人，他坎坷的一生没有令他消沉，反而使他更加光彩照人，应该说也与他的思想性格有关吧。苏轼写过一本第一流的散文集《庄子》，他的浪漫气质和庄子奇特的想象、汪洋恣肆的文笔极易产生共鸣。庄子完全是一个浪漫不拘的人，他既是清净无为，又是躁动有为的。苏轼第一次读到庄子的书时，还十分年轻，当时他就曾经感叹道：“我以前虽然有这种看法，嘴里却说不出，今天见到这本书，可真是合我的心意啊！”

苏轼并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书法上，他的字却被评为宋代第一，他靠的是什么呢？靠他的艺术道路走对了。他以抒发自己至大至刚之气为主，继承了颜字等博大的气派，伸张了宋朝时崇尚意境的时代潮流。比如和明清时的书法家相比，何绍基在书法上的功夫恐怕比苏轼大得多，他不能称清代第一，因为他是以临摹为主，虽然在颜字上加了创新，可他的字还是颜体字。

苏轼，就是这样一个即使在不经意间也能展现出非凡魅力的人。他的个性复杂多变，很难了解。他是个大哲学家，不可能变成清教徒；他是儒家子弟，不可能变成酒鬼；他了解生命，珍惜生命，不会把时光都浪费在醇酒美人上。苏轼是自然诗人，怀有特殊健全的神秘人生观，往往和自然密切融和，他与自然、四季、雨、雪、山、谷充分接近。

杭州也并非遍地荷花与牡丹，东坡也不可能一天到晚谈笑、唱歌、月夜泛舟，因为狱中有一万七千个欠债和私贩官盐的犯人等着宣判，有蝗灾要治理，有航道要疏通，有饥荒要调查。在苏轼这段时期所写的几百首诗中，我们甚至难以找到固定的主调。他写喜剧诗和讽刺诗，充满才情的风景诗、抒情诗、欢笑诗，也有不少忧愁的诗句。在他酒席上喧哗、愉快、嬉笑的外表隐藏着不安、沮丧、悲哀甚至恐惧的情绪。没有人比苏轼更能充分表达民间的疾苦，他的才华使他将别的作家想要表达的一切更充实、更完整地化为诗歌和优美的文字。但是苏轼离开京师来这儿，心里挂着创痛。他对政事的发展倾向暗感恐惧和悲哀，他的伤痛比别人更深。他在密州写给乔太博的一首诗总括了熙宁四年（1071年）到熙宁九年（1076年）间多产时期他在杭州和密州的一般看法。

百年三万日	老病常居半
其间忤忧乐	歌笑杂悲叹
颠倒不自知	直为神所玩
须臾便堪笑	万事风雨散
自从识此理	久谢少年伴

另一首写给孔文仲的诗表达了他对官厅盛事的轻蔑感。

我本麋鹿性 谅非伏辕姿
金鞍冒翠锦 玉勒垂金丝
旁观信美矣 自揣良厌之
人生各有志 此论我久持
他人闻定笑 聊与吾子期

随着他欢笑的诗篇我们也听到呼喊与叹息。我们听到鸟雀的鸣声夹着狱囚的呻吟，水车的咕咕声夹着老农妇的哀诉，湖上的喜宴也夹着他稀发渐白的怨叹。苏轼不是一个高兴时故作悲哀，悲哀时故作欢笑的人。很多他的朋友与他通信，他们都不赞成王安石的新政，只是因为王安石当时气势正如日中天，所以他们大都把意见搁在心里。欧阳修已经去世；司马光潜心写书；张方平沉迷酒杯；苏辙明哲保身。苏轼不够圆滑，他亲眼见到百姓受苦，除了田园美诗，他还不断写乡村不美的一面。他知道自己的诗篇远达京城，但是他不在乎，他的这些诗一天天堆成他罔顾政府威信的罪名。

熙宁七年（1074年），苏轼杭州任满，当时他弟弟在山东省济州（现在的济南）任职，苏轼自请调到该省，被批准派往青岛附近的密州担任太守。他在密州只干了两年就被调任徐州太守，由熙宁十年（1077年）四月做到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

苏轼与杭州南北寺庙的僧友告别后，就携家北上。他妻子王闰之买了一个十二岁的丫环，生性聪颖，名叫朝云，她

后来在苏轼的生命中占据了重要位置。

密州是个非常贫瘠的地区，主产大麻、枣子和桑树，此地的生活与杭州真有天壤之别。虽然做了太守，可苏轼的日子过得十分清苦，因为当时官员薪俸锐减，苏轼甚至以杞菊充饥。在《杞菊赋》的序言中，他写道：“余仕官十有九年，家日益贫，衣食之奉殆不如昔者。及移守胶西，意且一饱，而斋厨索然，不堪其忧，日与通守刘君延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扞腹而笑。”

王安石罢官，新得势的惠卿又设了一种新法税，密州百姓根本无法负担。苏轼外出时，竟见到许多儿童被抛置路旁，有的大声号哭，有的奄奄一息，苏轼的心大受震撼，试想，做父母的若非到了实在万不得已的地步，谁肯丢下自己的孩子不管呢？苏轼救下了三四十个即将饿死的孩子，把他们安顿在各个家庭里，不过，“洒泪循城拾弃孩”，苏轼这样做，也只是杯水车薪，他是无力改变现状的。

这是苏轼最沮丧的时期，说也奇怪，诗人在最悲哀的时候却写出了最好的作品。这段时期，他的作品日臻成熟，愤怒与尖酸都过去了，只留下满心安祥与去意，就连他在自然中的欢乐，以及当日的趣味也更醇美，与杭州时期的情致截然不同。他愈来愈仰慕陶渊明，他的《西斋》诗中，不但可以看出真正的安祥与满足，而且完全和自然融为一体，对自然的声音色彩也含有平静的喜悦，与田园大诗人陶渊明的诗相比，可谓不分上下。

西斋深且明 中有六尺床

病夫朝睡足 危坐觉日长
昏昏既非醉 禹禹亦非狂
寒衣竹风下 穆然中微凉
起行西园中 草木含幽香
榴花开一枝 桑枣沃也光
鸣鸠得美阴 困立忘飞翔
黄鸟亦自喜 新音变圆吭
杖藜观物化 亦以观我生
万物各得时 我生日皇皇

奇怪的是，苏辙总是能使苏轼产生优秀的作品。由杭州往密州的途中，苏轼曾有一首《沁园春》词写给苏辙，从这首词中，还可看出到密州之前，苏轼有很大的政治抱负，词中的政治胸怀与上首《西斋》诗中体现的归隐之想，存有很大差别。

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
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
云山摛锦，朝露清清。
世路无穷，劳生有限，
似此区区长鲜欢。
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

当时共客长安，
似二陆初来俱少年。

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
致君尧舜，此事何难。
用舍由时，行藏在我，
袖手何妨闲处看。
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

熙宁九年（1076 年）中秋，苏轼醉后抒情，怀念兄弟，写下了千古绝唱，《水调歌头》词。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
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
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古人评论这首词，说此词的前半阙是“天仙化人之笔”，今天看来，本词的通篇风调，又何尝不是如此？

诗词以言志，苏轼这首中秋词作，有一题序，他写道：“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大醉”

遣怀是主；“兼怀子由”是辅。所以说，苏轼的主旨在于抒发被贬外任的孤独情怀。词中杂用道家思想，联系自然世界，俯仰古今变迁，感慨宇宙流转。作者厌恶险恶的官场风波，揭示永恒的人生理念。运用直接描绘的形象范畴，勾勒一种皓月当空、美人千里、孤高旷远的境界氛围，把自己遗世独立的意绪与往昔的神化传说融和在一起，在月的阴晴圆缺当中，渗进浓厚的哲学意味，是一首自然与社会高度契合的感喟作品。

全词起首劈头一句痴问，凌空而来，看似无理。这是一个人人都清楚但又没有答案的问题，就如同一加一等于二，而词中却沉积着作者平日里的多少思考，多少困惑。词人的思绪在一轮满月的感发下漫无边涯地游荡，由人间到天国，又由天国到人间。本想乘风归去，超越尘世，但又深自彷徨，担心难耐那份清冷和孤寂，终又归结到对人间生活的眷恋。在这一连串的追问和揣度之中，旋风般地表现了作者内心出世与入世的矛盾和自我解脱的感情风波。下片开头，情感由高潮跌入平川，形成一个间歇。月光如水，照着华丽的楼阁、雕花的门窗和心事重重不能成眠的人。在人与月的默默对视中，情感再一次振起，转而恼月。月真是不解人意，经常在人孤独寒伧的时候却显示出它的圆润皎洁，让人自惭形秽徒生遗憾与惋惜。有什么办法呢？惟有自我解脱而已。人生本来就由悲、欢、离、合构成，一如月亮本来就有阴、晴、圆、缺，自古皆然。既然如此，那就用坦然的态度来对待难以求全的事情，平静长久，共赏这千里明月吧！词的结尾似乎归于宁静达观，但那份自我排解下的苍凉依然能够感觉到，在词中，

苏轼寄托了人生最迷茫最深厚的一段感情。

前面曾经提到，苏轼为豪放词派的创史人，从以下的两首词中，可以看出苏轼豪放不羁的个性特征，同时，也可领略到苏轼抒情的一面。两首词皆作于作者在密州期间。

“江城子
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
左牵黄，右擎苍，
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
为报倾城随太守，
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
鬓微霜，又何妨。
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
会挽雕弓如满月，
西北望，射天狼。

望江南
超然台作

春未老，风细柳斜斜。
试上超然台上看，

半壕春水一城花。

烟雨暗千家。

寒食后，酒醒却咨嗟。

休对故人思故国，

且将新火试新茶。

诗酒趁年华。

苏轼之前，词仅用来描述香艳软媚的儿女之情，内容多属花间柳下、浅斟低唱，因此人们认为词品不高，其地位始终赶不上诗的地位。从苏轼起，词开始走向广阔的天地，凡是可以写诗的内容，无一不可以写词，上面的《江城子》词，在词的发展史上有着里程碑的意义。至于《望江南》词，超然台是苏轼在熙宁八年（1075年）年底，修葺密州园北旧台，由苏辙命名的。摘此词，是因为“超然”境界，可说是苏轼在密州时期心境和词境的具体体现。

第四章 黄楼乌台

就连苏轼这样的天才，也是“人生四十才开始”，如今苏轼进入徐州时期，也就是“黄楼”时期。苏轼突然找到了自己，他第一次变成实干的人物，忙着做事、建筑、参加公众活动，从此一生建树颇多。他担任杭州通判无法办大事；在密州虽任太守，但因密州偏远贫穷，也没有机会一展其才；后来他被迫短期退休，进入政治晦暗期；接着就出现了完美、圆整、成熟、活跃而忠贞的苏东坡，他幽默练达，是百姓的朋友和斗士，有着一个伟大的灵魂，不过苏轼被捕谪居之前，徐州太守的政绩已证明他是实干的人物，也是能干的办事人才。

熙宁九年（1076年）年底，苏轼奉诏离开密州，被派往山西西南端的河中府任职，次年一月他由济南进京，他弟第一家就住在济南。苏辙当时不在家，风传政事将有大变迁，此时王安石同党已先后垮台，王安石复出又垮，谁也不知道下一步将有什么变化。

苏辙是个沉静而果断的人。苏轼曾一再上表提到税制和征兵的改革，劝皇帝不要征所得税；苏辙始终保持沉默，如今却觉得时机已到，可以力倡全面的政治改革。王安石十月已在出京途中，苏辙没有等哥哥，直接带着一份全面革新的

奏折进京。

苏辙的家人还留在济南，他们迎接了苏轼。苏轼在济南住了一个月左右，熙宁十年（1077年）二月十日，两兄弟的眷属到达京城附近的黄河岸边，苏辙出京到河岸以北三十里的地方接他们，两兄弟在雪中畅游了几日。苏辙带给哥哥一则消息，说苏轼在河中府的新职已被取消，改派为徐州太守。

他们抵达京师，遇到一件十分费解的事情：门吏告诉苏轼，不许他入京，却又没有合理的解释——这也许是因为政局不稳，有些官员不希望皇帝见到苏轼，于是借皇帝的名义发的命令。两兄弟只好回头，折往东城外的友好范镇家中。

这时苏轼的长子苏迈已经十八岁，该娶亲了。研究苏学的人始终没有探明女方的身份，只知道苏迈是在此时娶的亲。

儿子娶亲后，苏轼携家眷往东，到现在江苏省境内的徐州任职；苏辙也携家眷到商邱（南都）任通判。他把家人交给好友张方平，陪哥哥到徐州，住了三个月才回到家人身边。

徐州不但是大城，也是战略要地，控制了山东南部的山区。过去几个朝代，徐州附近常有战役发生，现在津浦铁路和陇海铁路就在这儿交会：二十年后水泊梁山著名的水浒故事就发生在这附近。城市临河，南面有两大高山环绕，深邃的急流绕过山下的市区。此地出产花岗细石、铁、煤，宋朝时就曾充分开采，此地的刀剑也很著名。苏轼喜欢这里天然的风光，喜欢各种精美的鱼蟹，他认为徐州是“暂留”的好地方。

熙宁十年（1077年）八月，苏轼刚到徐州上任三个月，徐州发生水灾。王安石曾想疏通黄河，但是花了五十万缗毫无

效果，主工程师畏罪自杀了。黄河在徐州以北五十里处的曹村决口，泛滥到梁山泊，溢满了南清河，水势蔓延了几百平方里。大水汇聚到徐州城下，被南面的高山挡住，水位不断高涨，九月达到二十八点九尺，如果不及时排水，徐州城就将倒塌。苏轼舍身救城，好几周都没有回家，他每天住在城墙顶的小棚子里，监督修固外墙的工作。城里有钱的人纷纷争着出城避水。苏轼说：“富户一旦出城，城里的百姓就都会动摇，我和谁来共同守城？只要我在徐州，就一定不会让洪水冲毁徐州城。”于是把那些有钱人又赶回到城里。洪水眼看就要超过东南外墙了，苏轼指挥把墙基加厚，城墙加高。挡水的防御工事长九十四丈，高十丈，宽两丈。苏轼亲自趟水到武卫营，唤来了卒长，向他寻求帮助。武卫营属禁军，直接归皇帝统领，不听命于地方官员。苏轼对卒长说：“黄河水就要冲毁徐州城了，事态紧急，虽然你们是禁军，也要请你们尽力帮助我。”卒长感动地说：“太守尚且不躲避大水，如我辈小人，自然更当效命。”就带领了他的士兵几千人，拿着畚箕和铁锤奔了出去，修筑了东南的长堤。这时北方的工事已做好，准备把洪水引入黄河故道。在洪水围城四十五天之后，十月十五日，黄河回归故道，向东在海州附近入海，洪水开始退去。

城市获得保全，人民都欣喜若狂，对苏轼万分感激。苏轼对暂筑堤不满意，就上表给朝廷，明列数字，要上面拨款兴建石墙，以备不时之需，可朝廷没有回音，他只好修改奏折，改建石墙为建木岸。皇帝下了一道公文，夸奖他的伟大功劳，次年二月苏轼得到三万多贯的拨款，一千八百担米粮

和七千二百个人工，他组织在城市东南建了一道木坝。苏轼性好建筑，就在这道外城墙上建了一座十丈高的楼台，起名叫“黄楼”。后来他在徐州写的诗集就叫《黄楼集》。

元丰元年（1078年）重九，黄楼举办盛大的庆祝仪式。苏轼非常高兴：百姓没有被洪水吞噬；大家花了半年多时间建成了水坝和楼台——黄楼属于全城百姓，是未来对抗水患的明显象征。全城的百姓都来参加这个典礼。东门上黄楼耸立，高达十丈，下面是五丈高的旗杆。楼台建成宽塔的形式，大伙儿上楼观赏四周的风光，从窗口望出去，早上的浓雾迷离，只听到下面船只的桨声，恍如置身大海船中，不久，天渐渐晴朗起来，远处的渔村和岩峰下的五六所庙宇历历可见。南面前端可以看见隆起的台地，以前曾是戏马台，如今建了一座佛寺，长长的新堤由庙宇开始，沿东城墙向北延伸，他们听见远处的潮声与下面鹅鸭的鸣叫声交织在一起，组成奇妙的乐章。最后是大宴宾客。

苏轼写了一篇文章纪念这盛大的场面，叫人刻在石头上，这块石碑，随着苏轼政治上的起落，经历颇不平凡。苏轼后来遭到放逐，他的一切碑铭都奉命拆毁，当时的徐州太守只把这块碑丢入附近的壕沟中。十年后，大家都忘记了这条禁令，皇家也开始收集他的文稿，在任的另一位徐州太守叫人把石碑从沟里挖出来，星夜赶制了几千份拓本，事毕之后，他恍然大悟似地说：“唉呀，我忘了，苏碑的拆毁令还没有解除，叫人来把这块碑毁掉吧。”石碑拆毁之后，拓本的价值越升越高，太守靠此赚了一大笔钱。

此时，人们已无法探知当初苏轼立于黄楼之上，举目四

望时的心情，从下面这首词中或许仍能触其一二吧。

永遇乐

彭城夜宿燕子楼，梦盼盼，因作此词。

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清景无限。
曲港跳鱼，圆荷泻露，
寂寞无人见。
惝如三鼓，铿然一叶，
黯黯梦云惊断。
夜茫茫、重寻无处，
觉来小园行遍。

天涯倦客，山中归路，
望断故园心眼。
燕子楼空，佳人何在，
空锁楼中燕。
古今如梦，何曾梦觉，
但有旧欢新怨。
异时对、黄楼夜景，为余浩叹。

燕子楼在彭城，属徐州境内，据说此楼是唐代张尚书为爱妓盼盼所筑。

苏轼真的梦到过唐代时的盼盼吗？不得而知。由词中可以领略到的是词人驰骋的思绪、词人的感慨：人生之梦未醒，只因欢怨之情未断。其感慨包容了多少古与今、倦客与佳人、梦幻与现实的绵绵情事，其感慨又超越了自我，推及了人生

和宇宙。词人从燕子楼想到黄楼，设想后人见黄楼凭吊自己，也和今日自己见燕子楼思盼盼一样，悟出了人生如梦似幻的道理。——这就是苏轼，狂喜之中也抹不去如影随形的淡淡愁绪。

任徐州太守的苏轼很受欢迎，不仅因为他抗洪有功，也因为他亲身关切狱囚的健康和利益，在当时，几乎没有其他太守这么做。他亲自去看犯人，派医生照顾生病的囚犯。苏轼指出，法律虽禁止地方官鞭打囚犯至死，对囚犯病死或失于照顾而死，却没有明文规定，他说，囚犯也是人。苏轼的行为赢得了囚犯及其家属的感激与尊敬。

有些小事只要有人肯做，就可以轻易做到，可惜只有苏轼这样的人才看得到。元丰元年（1078年）徐州春旱，苏轼去城东二十里外的石潭求雨，求雨之后，又于雨后去石潭谢雨，路上，苏轼曾作了几首诗，其中一首如下：

浣溪沙

簌簌衣巾落枣花，
村南村北响缫车，
牛衣古柳卖黄瓜。

酒困路长惟欲睡，
日高人渴漫思茶，
敲门试问野人家。

词中，苏轼以最寻常最普通最不“值得”入咏的景物风光，将自己的感叹融于其中：乡野人家尚且能赠我粗茶一杯，为我解渴；我作为一城百姓的父母官，又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眼看他们处于春旱之下，我能带给他们清凉的雨水吗？杰出的诗人和称职的官员一样，既要有大手笔，同样也肯从小处着手。

苏轼的诗名不断提高，欧阳修去世后，他成为全国公认的第一大学者，欧阳修当初的话应验了。学者都认苏轼为师，著名的“苏门四学士”，包括苏轼在淮阳结识的张耒，在杭州结识的晁补之，传说中娶了苏小妹的浪漫诗人秦观，江西诗派的始祖黄庭坚。四学士中以黄庭坚居长，时人把苏黄相提并论，但黄庭坚始终以苏东坡的门下自谦。整个学术界都敬爱东坡，推重东坡，那年九月底黄楼的一次大聚会上，苏轼开朗风趣，毫无心机，赢得士林一致的热爱。正因为他受欢迎，威望高，日后他被捕受审才引起全国的关注。

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苏轼奉命调往湖州（今属浙江），苏轼上表谢恩，因为对朝廷那些不利于民的措施不敢大胆直言，于是他把谏言写入诗歌中，希望对国家有所补益。苏轼是个性情直率的人，如他自己所说，遇到不平之事，他是“如蝇在食，吐之乃已”，他一直作诗描写百姓的困苦和一些新法带给百姓的危害，政客小人还能忍受，现在他直接提到他们——王安石门下窜升的李定和舒囊，这是一伙见风使舵、毫无原则的小人。苏轼一上表给皇帝，皇帝就忍不住会当着朝臣称赞他，小人们怕苏轼得势，就干脆阻止苏轼入京见皇帝。

元丰二年（1079年）六月，苏轼到湖州后不久，有位御史摘取苏轼谢恩表状的四句话，告他讽刺政府。几天后舒襄、李定也先后状告苏轼，说他的诗词作品中有不忠于朝廷的地方。李定等人希望皇帝下旨杀死苏轼，神宗并不想杀苏轼，他只是认为案情既然正式提出，他愿意让御史们详细调查。

朝廷派官差皇甫遵去湖州，解除苏轼的官职，押回京师审问。苏轼与家人道别，长子苏迈陪他进京。百姓们出来送他们的太守，泪如雨下。

苏轼被押走后，他的家人们决定进京，抵达安徽宿县，御史又派差官去搜拿诗篇、信函和其他文件。许多士兵围住苏轼家人的小船，翻箱倒柜，把东西随处乱丢，女人和孩子都吓坏了。士兵们走后，女人们迁怒于诗稿，于是大烧文稿，后来苏轼发现只剩三分之一的文稿没被烧掉。

苏轼七月二十八日被捕，八月十八日关入御史台监狱，接受了近两个月的审讯。

苏轼在狱中，儿子苏迈天天去牢中送饭。他们暗中约定平时只送菜和肉，万一有坏消息就送鱼来。有几天苏迈出京借款，委托一位朋友代他送饭，临走却忘了告诉他这一秘密约定，结果这位朋友送了些鱼给苏轼。苏轼以为难逃一死，写了两首告别诗给苏辙，诗中委托弟弟照顾自己的家人，还感谢皇帝对自己的恩情。这两首诗后来被狱卒上交，皇帝见了之后，大受感动，所以御史虽施高压，给苏轼造成极不利的局面，最终皇帝仍释放了苏轼，这两首诗，可以说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就是所谓“乌台诗案”。乌台，是御史台监狱的代称。

审讯大约在十月初终结，证言交到皇帝手中。牵连的人不少，尤其附马王诜牵涉最重，审讯中发现他和苏轼曾交换过许多礼物。皇帝下令，与苏轼有诗信来往的人都要把手边的诗文交给法庭调查。

这时候，一向支持苏轼的仁宗太后病死了。她临终前曾对皇帝说：“我记得当初苏轼兄弟中进士，仁宗先皇曾高兴地对他说，他那天为子孙得到两个相才。我现在听说苏轼因写诗而获罪，我想这是小人陷害他，他们在他的政绩上挑不出毛病，就想用他的诗来定罪。这些控告不是太卑鄙了吗？我的身体已无法康复，希望你不要冤枉无辜——那样上天会动怒的。”

十月三十日审问的官员们做了一份案情摘要，呈给皇帝。由于太后殡葬，案件悬搁了很久。苏轼在牢中等候命运的判决时，曾发生过一件神秘的事情。

几年之后苏轼对朋友们谈起这事，他说：“审问结束后的一天夜里，我正要睡觉，突然一个人进入牢内。他一言不发，丢了一个小盒子在地板上，倒头就睡。我以为是别的囚犯，便没理他，径自睡了。睡到凌晨时分，我觉得有人推我，睁开眼来，那个人对我说：‘恭喜。’我问他怎么回事，他只说：‘好好睡，别担心。’说完就拿着盒子出去了。”

原来舒囊等人一直想办法劝皇帝杀苏轼，皇帝不忍心，就暗地里派宫里的人到狱中去查看。那位使者刚到不久，苏轼便呼呼大睡，鼾声如雷，后来宫人回去向皇帝报告，说苏轼睡得很安详，皇帝便对朝臣说：“我知道了，苏轼心中没做亏心事。”

最终，苏轼免于被杀，被发配往黄州。

通常皇家出殡总要大赦天下，依照法律和习俗苏轼应该减罪。御史们原满心想把反对派一网打尽，这样一来他们的心血全白费了。李定和舒襄十分担心，李定强烈地反对特赦，舒襄更要求把苏轼和他的另几个朋友全都处死。

等苏轼的朋友交出的证物都调查完毕，皇帝派了自己信任的人重审。根据有关留传下来的资料看，诽谤政府本该贬居或处两年的苦役，但苏轼的情况较严重，应该取消他的两个官衔。不过这种重大的案件最后会由皇帝亲自判决。

十二月二十九日，苏轼的判决公布，他被贬到汉口附近的黄州，担任团练副使的小官职，条件是限住该处，不得随便离开，也无权签署公文。这样的判决，令李定和舒襄大失所望。

苏辙上书给皇帝，愿以一切官爵来替哥哥赎罪，结果他被降调高安担任筠州监酒。高安离黄州一百六十里。

被关了四个多月的苏轼走出监狱，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提起笔。他又开始写诗！

平生文字为吾累 此去声名不厌低
塞上纵归他日马 城东不斗少年鸡

这首诗里，塞翁失马和少年斗鸡的典故，依然带有双关和讽刺意味，难怪苏轼写完诗后，自己也忍不住说：“我真是无可救药了。”——正所谓本性难移。

元丰三年（1080年）一月一日，苏轼带着二十一岁的长

子苏迈离开京城，前往谪居地黄州。他走陆路，把家眷交给苏辙照管。苏辙带领自己一大家人和苏轼的家人，辗转数月，到达九江，然后他让自己的家人等着自己，他则上溯长江，把苏轼的太太王闰之、妾朝云和两个小儿子送到苏轼身边。苏轼二月一日已到黄州，他的家人四月才到。

黄州是汉口下游的河边小镇。苏轼在家人没到时，先住在一座寺院里，该寺离江甚远，位于一座林木茂密的小山边。太守姓徐，对苏轼十分热情。长江对岸的武昌太守朱寿昌，常过江来看望苏轼，苏轼曾有一首词赠给他。

满江红

寄鄂州朱使君寿昌

江汉西来，高楼下，蒲萄深碧。
犹自带、岷峨雪浪，锦江春色。
君是南山遗爱守，
我为剑外思归客。
对此间、风物岂无情，殷勤说。

《江表传》，君休读；狂处士，真堪惜。
空洲对鹦鹉，苇花萧瑟。
不独笑书生争底事，
曹公黄祖俱飘忽。
愿使君、还赋谪仙诗，追黄鹤。

鄂州，即武昌。这首词以辞气慷慨见长，一种苍凉悲慨、

郁愤不平的激情，在字里行间涌流，我们可以体会出苏轼被贬黄州初期复杂矛盾、无法平静的内心世界。

到黄州后，苏轼开始思考生命的真谛，他死里逃生，人也比以前沉默。有时，他会在雨后的傍晚一个人到东山脚漫游，寻访庙宇、花园和清溪。南岸有矾山，高耸在湖泊水道交织的平原里。苏轼在独自漫步中，深思自己的个性，研究如何得到心灵的平安。他越来越虔诚地信教，他在《安国寺记》中说：“余二月至黄舍。馆粗定，衣食稍给，闭门却扫，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又观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非独今之所以得罪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触类而求之，有不可胜悔者。于是喟然叹曰：‘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盖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始所生而不可得。一念清静，染污自落。表里爽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

可是在苏轼心中，一股与宗教冲动相反的儒家趋势却将他拖往另一个方面。不错，人是应该在宗教中追求平安，但是如果照佛家所说，人生只如幻影的话，人就该完全脱离社会，人类就会绝种，烦恼自然就不复存在。因此佛家虚空无我，去除一切私念的目标和儒家对人类踏实的责任观时常发生冲突。

在寺庙住了一阵子后，苏轼的家人平安到达。太守对他们一家礼遇有加，让他们住在临皋亭，此地因此而家喻户晓。一切似乎固定下来。当年苏轼的次子苏迨十二岁，幼子苏过

十岁。

苏轼写信给朋友说：“寓居去江无十步，风涛烟雨，晓夕百变。江南诸山在几席，此幸未始有也。”其实临皋亭并没有什么特殊的风华，风景之美，一半靠地理，另一半则靠欣赏者的眼光。苏轼身为诗人，不免看到、感觉到别人在天国乐园也无法感受的韵味。苏轼在杂文中说：“东坡居士酒醉饭饱，倚于几上，白云左绕，清江右回，重门洞开，林峦岔入。当时若有思而无所思，以受万物之备。惭愧惭愧。”另一篇给朋友的信中，语气则很幽默：“临皋亭下十数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江水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闻范子丰新第园池，与此孰胜。所以不如君者上无两税及助役钱尔。”

风景虽美，却当不了饭吃，苏轼一家人的生活十分清苦，他曾给秦观写信描述自己的一套特殊的开支预算法，说：“……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省，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钱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以待宾客。此贾耘老法也。度囊中尚可支一岁有余。至时别作经画，水到渠成，不须预虑。以此胸中都无一事。”

元丰四年（1081年），苏轼似乎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夫，春夏之际，他在老友马正卿的帮助下，向州郡求得黄州东门外东坡故营地数十亩，开垦耕种，自号“东坡居士”。他早想归隐田间，却没想到自己被迫如此当上了农夫。

东坡农舍在小山旁。顶上是一间三房的小屋，俯视下面的亭台，亭台下便是著名的雪堂——这年冬天，黄州大雪盈

尺，十二月二日微雪，至二十五日大雪始晴。下雪期间，苏轼在东坡营造了房屋，取名雪堂。雪堂的墙上有苏轼亲笔画的森林、河流、渔夫的雪景，后来这里变成他待客的地方。

雪堂的石阶下有一座小桥跨沟而过。除了雨天，平常小沟都是干的。雪堂东面是他亲自种的一棵大柳树，再过去是一个小井，泉水冷冽。东面下方是稻田、麦田、一大排桑树、菜蔬和一个大果园。苏轼还把附近一个朋友送他的茶树也种在农场上。

远景亭在农舍后方，立在一堆土岗顶，四处风光一览无遗。他的西邻姓古，有一大片巨竹，长得十分茂盛，连天空都遮住了。苏轼夏天就在这儿乘凉。

建筑是苏轼的本能，他决心为自己造一个舒舒服服的家。他筑水坝，造鱼塘，种了朋友送来的花木、邻居送来的树苗和故乡来的菜蔬，他的精力全用在做农夫上。他看见成熟的水稻，心里充满自豪与满足。

苏轼的家庭也平和而幸福，也许苏太太最高兴的是苏轼经常下厨，并且烧得一手好菜。现在中国各处的餐厅饭馆中，菜谱上列出的东坡肘子和东坡鱼，就是苏轼首创的。

苏轼在东坡生活得满意自适，有似晋代诗人陶渊明田园生活一般。他有一首词，记载了这种情景。

江城子

陶渊明以正月五日游斜川，临流班坐，顾瞻南阜，爱曾城之独秀，乃作斜川诗，至今使人想见其处。元丰壬戌之春，余躬耕于东坡，筑雪堂居之，南

挹四望之后丘，西控北山之微泉，叹然而叹，此亦斜川之游也。乃作长短句，以《江城子》歌之。

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

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

昨夜东坡春雨足，

乌鹊喜，报新晴。

雪堂西畔暗泉鸣。北山倾，小溪横。

南望亭丘，孤秀耸曾城。

都是斜川当日景，

吾老矣，寄馀龄。

有些乐趣只有诗人居士才能享受。陶渊明辞官归隐，曾写了一首《归去来兮》赋，苏轼每天在田里耕作时，重组其中的字句，配上民歌。他教家人唱，自己也一起唱，还用竹枝敲击着牛角打拍子。

苏轼在哲学中也能找到安慰。他在雪堂的墙壁和门板上写了三十二个字，日夜观赏。内容是四道警告：

出與入羣 蹶痿之机

洞房清宫 寒热之媒

皓齿峨眉 伐性之斧

甘脆肥浓 腐肠之药

失去尘间美好享受的人有福了！就是这种幽默感使苏东坡能随处得到快乐与满足。后来他被逐海外，没有药品也没

有医生，他对朋友说：“我想到京师每年有多少人死在大夫手中，觉得自己真幸运。”

现在苏轼自食其力，心满意足。他有很慈悲的信仰，这一点，使人们觉得他亲切。黄州因为贫穷，当地穷人养不起孩子，就有些人在孩子出生后即将其溺死，溺婴的恶俗使苏轼深受震撼。他给武昌太守写了一封信说及此事，内容十分感人。

上鄂州太守朱康叔（寿昌）

轼启：

昨日武昌寄居王殿直天麟见过。偶说一事，闻之辛酸，为食不下。念非吾康叔之贤，莫足告语，故专遣此人。俗人区区，了眼前事，救过不暇，岂有余力及此度外事乎。

天麟言岳鄂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尤讳养女，以故民间少女多鰥夫。初生辄以冷水浸杀，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闭目背向，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嚶良久乃死。有神山乡百姓名石揆者，连杀两子。去岁夏中，其妻一产四子。楚毒不可堪忍，母子皆毙。报应如此，而愚人不知创艾。天麟每闻其侧近者有此，辄往救之，量与衣服饮食，全活者非一。既旬日，有无子息人俗乞其子者，辄亦不肯。以此知其父子之爱，天性故在，特牵于习俗耳。

闻鄂人有秦光亨者，今已及第，为安州司法。方

其在母也，其舅陈遵梦一小儿挽其衣，若有所诉。比两夕辄见之，其状甚急。遵独念其姊有娠将产，而意不乐多子，岂其应是乎。驰往省之，则儿已在水盆中矣，救之辄免。鄂人多知之。

准律故杀子孙，徒二年，此长吏所得按举。愿公明以告诸邑令佐，使召诸保正，告以法律，谕以祸福。约以必行，使归转以相语。仍录条粉壁晓示，且立赏召人告官赏钱，以犯人及邻保家财充。若客户则及其地主。妇人怀孕，经涉岁月，邻保地主无不知者，其后杀之，其势足相举觉，容而不告，使出赏固宜。若依法律行遣数人，此风便革。

公更使佐各以致意，诱谕地主豪户。若实贫甚不能举子者，薄有以周之。人非木石，亦必乐从。但得初生数日不杀，后虽劝之使杀，亦不肯矣，自今以往，缘公而得活者，岂可胜计哉。佛言杀生之罪，以杀胎卵为重。六畜犹尔，而况于人。俗谓小儿病为无辜，此真可谓无辜矣。掉毫杀人犹不死，况无罪而杀之乎。公能生之于万死中。其阴德十倍于雪活壮夫也……

轼向在密州遇饥年，民多弃子。因盘量劝诱米，得出剩数百石别储之，专以收养弃儿。月给六斗。比期年，养者与儿，皆有父母之爱，遂不失守。所活者亦数十人。此等事在公如反手耳。恃深契故不自外，不罪不罪，此外惟民自重。不宣。轼再拜。

他自己还成立救儿组织，请附近诚实博爱的人担任会长。该会向富人捐得不少钱财，请他们一年各出十缗钱以上，用来买米、买布、买棉被。他们去乡村调查即将生产的妇女，只要他们肯养小孩，就送给她们钱、米、布。苏轼说：一年若能救下一百个婴儿，也就功德无量了。他自己虽然很穷，也每年捐钱十缗，救助婴儿。

应该说苏轼现在过着快活的日子。黄州虽是贫瘠的小镇，但是万缕闲情，美妙的风光，诗人敏感想象力，再加上月光美酒，这一切混合成强大的魅力，使苏轼活得很诗意。农田垦好，他衣食无忧。他有一大群朋友，大家都和他一样自由，一样口袋空空却悠闲无比。

这是梦幻般的生活，苏轼说欧阳修这一首诗形容得最好：

夜凉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种花。
棋罢不知人换世，酒阑无奈客思家。

他甚至有了闲情，把七岁时在家乡眉山见到一个老尼姑的旧事想起，当时那位尼姑讲起花蕊夫人的故事，背出一首词。苏轼只记下了其中两句，如今到黄州，他则把这首词自己补记了出来。

洞仙歌

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
水殿风来暗香满。

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
人未寝，欹枕钗横鬓乱。

起来携素手，庭户无声，
时见疏星渡河汉。
试问夜如何？
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绳低转。
但屈指西风几时来，
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

苏轼的词，手笔的高超，情思的深婉，使人陶然心醉，使人渊然以思，爽然而又怅然，一时莫明其故安在。继而再思，始觉他于不知不觉中将一个人生的哲理问题，已然提到了你的面前，使你如梦之冉冉惊觉，如茗之永永回甘，真词家之圣手。最后终词之句，苏轼感叹人生不易常是在现实缺陷中追求想象中将来的美境。美境纵来，事亦随变，如此循环，永无止息——而流光不待，已在人们的期待中偷偷流逝了！当姓朱的老尼姑追忆幼年之事时，花蕊夫人早已不在；当苏轼写这首词时，老尼姑也早已作古；当后人读东坡的词时，他又在何处呢？……短短一首词，却令人悲欢交织，喜而又叹！

从这首词，能令人充分体会到苏轼的才华，甚至觉得，非要把词分为“婉约”、“豪放”派别，而把苏轼的词归入一类，实在贬低他了。

在黄州期间，苏轼写了更多的诗词和散文，从风格及内容看，其思想更加成熟，运用词句信手拈来，而给读者以深

深的心灵震撼。

满庭芳

蜗角虚名，蝇头微利，
算来着甚干忙。
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
且趁闲身未老，须放我、些子疏狂。
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

思量、能几许？
忧愁风雨，一半相妨。
又何须抵死，说短论长。
幸对清风皓月，苔茵展、云幕高张。
江南好，千钟美酒，一曲《满庭芳》。”

这首词的最好诠释，可以摘苏轼的《答李端叔书》的一段话：“轼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既及进士第，贪得不已，又举制策，其实何所有。而其科号为‘直言极谏’，故每纷然诵说古今，考论是非，以应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为实能之，故哓哓至今，坐此得罪几死，所谓‘齐虏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轼为欲立异同，则过矣。妄论利害，谗说得失，此正制科人习气。譬之候虫时鸟，自鸣自己，何足为损益。”

苏轼兼住农庄雪堂和城内的临皋亭，每天来回跑，他脱

下文人的衣帽，换上普通农夫的衣裳，一般人并不认识他。他的生活离不开月夜和美酒。

一夜，苏轼和太守在湖上饮酒，回去后，因敲门不开，立于江边，一时感慨写下一首《临江仙》词。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
家童鼻息已雷鸣。
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
夜阑风静縠纹平。
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

第二天谣言纷起，说苏轼到江畔写了这首告别词，就乘船逃走了。谣言传到太守那儿，他吓得要命，因为他有责任不让苏轼离开黄州。他立刻出去找，发现苏轼还在睡觉，鼾声如雷，最后这个谣言传到京师，连皇帝都听到了。

当初任徐州知州时，苏轼曾写过一些描写自然景观的词，词中，呈现的大多是奔腾奋发、蒸蒸日上的景象，到黄州后，苏轼心境发生很大变化，甚至在普通景物的描写中，我们也可以注意到这一点。比如一首《鹧鸪天》词。

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
翻空白鸟时时见，照水红蕖细细香。

村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通词一派幽狭的气氛。

而同样是酒，不同的时间与心情的区别下，其味却也不同。到黄州后的第一个中秋佳节，皓月之下，苏轼手握酒盏，回首往事，瞻念前程，不免百感交集。

西江月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
夜来风叶已鸣廊，
看取眉头鬓上。

酒贱常愁客少，
月明多被云妨。
中秋谁与共孤光，
把盏凄然北望。

苏轼此时的心情，与初到黄州时可以说十分一致。

卜算子

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

谁见幽人独往来？

漂渺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

拣尽寒枝不肯栖，

寂寞沙洲冷。

一个是在“缺月挂疏桐”的夜，一个是在中秋之夜，月有圆有缺，人，却是同样的冷清寂寞！

不过，这两首词都是苏轼到黄州不久后所作，之后，自由的生活使他的心灵产生蜕变，又反映到作品中。刻薄的讽刺、尖锐的笔锋、一切激情与愤怒都过去了，代之而起的是光辉、温暖、亲切、宽容的幽默感，绝对醇美，完全成熟。

苏轼松弛自在的时候所写的小笔记最能表现出其成熟的幽默感。他开始在笔记中写下许多不连贯的短笺，不含道德训示，也没有什么作用，却非常受欢迎。

有一篇故事提到两个乞丐：

有二措大相与言志。一云“我平生不足惟饭与睡尔。他日得志，当饱吃饭了便睡，睡了又吃饭。”另一云“我则异于是，当吃了又吃，何暇复睡耶。”

苏轼对世人的贡献远超过他从世上收取的一切，他到处捕捉诗意的片刻，化为永恒，使我们大家都充实不少。他现在过的浪民生活很难视为一种惩罚或拘禁。他享受这种生活，写出四篇巨作：短词《大江东去》，两篇月夜访“赤壁”的文章，以及《承天夜游》。两篇月夜记游的文章以“赋”体写成，

这两篇文章流传千古，因为短短几百个字就道出了人在宇宙中的渺小，同时又说明人在此生可以享受大自然无尽的盛宴，没有人写得比他更传神，虽然不押韵，只运用灵活的语言，他却创造出普遍的心境，无论读者读多少遍，还是具有催眠般的效果。此处道出人类在浩瀚宇宙中的渺小，效果可比山水画。我们只看到一点点风景的细节，隐在空白的水天内，两个小人影在月夜闪亮的河上泛舟。从此，读者就迷失在那片气氛里。

元丰五年（1082年）十月，苏轼和两个朋友从雪堂出来，要到临皋亭去。路上经过黄泥坂。地上洒满白霜，树枝光秃秃的，他们看到地上的人影，抬头望见明月，竟被夜色迷住了，开始轮流唱歌。后来他们回去弄了些酒菜，又乘船到赤壁之下。水位下降了些，江面的石头一一露了出来，赤壁高高耸立在岸边。苏轼兴致勃勃地登上赤壁，仰天长啸。到午夜，四顾寂寥。两只孤鹤由东方飞来，白色的羽毛有如仙人的白衣。鸟儿戛然长叫，由舟顶向西飞，苏轼不知是什么预兆，不久各自回家，上床做了一个梦，梦见两个道士身穿羽衣，认出是他，就问他赤壁之游如何，苏轼问他们的姓名，他们不肯说。东坡说：“鸟呼噫嘻，我知之矣，畴昔之夜，飞鸣而过我者，非子也耶？”道士笑笑，苏轼就醒了。他开门看看，眼前只见空空的一片，什么也没有。由这篇文章看，苏轼建立气氛的方法，是提出了另一个世界——仙境。

就是这一时期，苏轼写过一篇月夜漫游的短记，描写他有一夜睡不着，起身到临皋亭附近的承天寺漫步赏月的事。这篇文章已列为经典之作，其漫不经心似的魅力颇受赞赏。

记承天寺夜游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明。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

本文奇短，却是瞬间佳境最敏感的记录。我们若相信苏轼文体天成的理论，认为一个人的文风只是心灵自然的流露，我们就可以看出他先得有那份心境，才能写出完美安祥、单纯自足的作品。

赤壁赋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

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箫者，依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徐音袅袅，

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苏子愀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鸟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酹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尊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所共适。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因为还有一篇《后赤壁赋》，所以人们习惯称上文为《前赤壁赋》。

文章从开头到“望美人兮天一方”，先写其“乐”。这种“乐”，既是“苦中作乐”，也表现了他作为士大夫文人所怀的

怡情山水之雅趣。时令正值七月十六，苏轼得与友朋泛舟遨游，心情正如那“不系之舟”一般，是恬淡闲适的，故而下文之写景，既无一不点明初秋月夜景致清幽凉爽的特点，又处处借着这“人化”了的“自然”，反衬出自己“飘飘欲仙”的舒坦情绪。但是，且慢，正如杜甫说过的那样：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苏轼之游赤壁，是属苦中作乐，故而一曲“望美人兮天一方”未终，便又从此中感怀“美人不见”的失望心情而进一步引出忧患于整个人生的哀思来。接应着这种情绪转换的，是那位同行者的洞箫声，借箫声，作者抒写了他的一腔忧思哀绪。紧接着又有“今安在”的一段问句和人生无常、渺小的一番感叹，前文的“乐”，至此已经烟消云散。这说明，最初那种恬淡闲适的“乐”，其实还只是一种比较浅弱的思想感情，它经不起忧患意识的袭击。或者也可以说：作者的内心世界中本自包含着不同的感情侧面，在清风明月、水光接天的静谧夜景“感召”之下，一时间诱发了他娱情山水的乐趣；而现在，在思古幽情触发之下，隐伏在心灵深处的那种忧患意识和忧患情绪却又油然勃发，顿时就掩盖了、淹没了刚才的“乐”绪。政治上的失意、仕途上的坎坷、命运的乖舛、生活的困苦，纷纷涌上心头。情绪由喜变悲，却并未终结，到这里，作者机智地采用了“变换角度”的相对主义方法论，从而得出了尽管宇宙不断变化而人类与天地却同样永存的结论，解释了疑问，又重新由悲而喜了。行云流水般的散文笔调和优美如画的诗歌意境的完美结合，令人赏心悦目中又有对人生哲理的思索。前人认为它标志着宋代散文赋的最高成就，这也言之有理。

后赤壁赋

是岁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将归于临皋。二客从予过黄泥之坂。霜露既降，木叶尽脱。人影在地。仰见明月，顾而乐之。行歌相答，已而叹曰：有客无酒，有酒无肴，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举网得鱼，巨口细鳞，状似松江之鲈，顾安所得酒乎？归而谋诸妇，妇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时之须。于是携酒与鱼，复游于赤壁之下。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予乃摄衣而上，履 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龙。攀栖鹘之危巢，俯冯夷之幽宫。盖二客不能从焉。划然长啸，草木震动，山鸣谷应，风起云涌。予亦悄然而悲，肃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听其所止而休焉。时夜将半，四顾寂寥。适有孤鹤，横江东来，翅如车轮，玄裳缟衣，戛然长鸣。掠予舟而西也。须臾客去，予亦就睡。梦二道士，羽衣翩跹，过临皋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游乐乎？问其姓名，俛而不答。呜呼！噫嘻！我知之矣。畴昔之夜，飞鸣而过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顾笑。予亦惊寤，开户视之，不见其处。

前、后赤壁赋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苏轼的《念奴娇》词，则更是广为传诵。

念奴娇
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
千古风流人物。
故垒西边，人道是，
三国周郎赤壁。
乱石崩云，惊涛裂岸，
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
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
羽扇纶巾，谈笑间，
檣櫓灰飞烟灭。
故国神游，
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人间如梦，
一樽还酹江月。

清代词论家评论东坡此词“自有横槊气概，固是英雄本色。”在《东坡乐府》中，最具有这种英雄气概的代表作，恐怕要首推这篇被誉为“千古绝唱”的《念奴娇》了。这篇词是北宋词坛上最为引人注目的作品之一。

这首词从总的方面来看，气势磅礴，格调雄浑，高唱入

云，其境界之宏大，是前所未有的。通篇大笔挥洒，却也衬以谐婉之句，英俊将军与妙龄美人相映生辉，昂扬豪情与感慨旷达的思绪迭相递转，做到了庄中含谐，直中有曲。特别是它第一次以空前的气魄和艺术力量塑造了一个英气勃发的人物形象——三国时代东吴名将周瑜，透露了作者有志报国、壮怀难酬的感慨，为用词体表达重大的社会题材，开拓了新的道路，产生了重大影响。

这首词，也是苏轼豪放派别的代表作。南宋俞文豹的《吹剑续录》中，有一段评婉约与豪放词的话，便列出了“大江东去”作为例子：

“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永）词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

过去的词论家把宋词分为豪放、婉约两个对立的流派。婉约派讲求词的婉丽，是指唐五代以来就已形成的一个派别。在苏轼以前，欧阳修倡导的古文运动在散文和诗歌方面，都已取得了很大成就，惟独在词的方面，没有多大的改变。当时少数作家的一些作品，如范仲淹的《苏幕遮》（碧云天）、《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写塞外风光和羁旅乡思；欧阳修的《浪淘沙》（把酒祝东风）感慨朋友聚散匆匆，后会难期；柳永的《满江红》（暮雨初收）写游宦行役之苦，已表现出同花间派不同的面貌。但这只是凤毛麟角，总的说来，这个时期的词，基本上仍然是沿袭唐五代的遗风。作家们都把词当作遣兴娱宾的工具，还没有摆脱“词为艳科”的传统观念；作

品除了描绘恬静闲适的享受生活，绝大多数都是写男欢女爱，别恨相思。“倚红偎翠”、“浅斟低唱”、“寸寸柔肠，盈盈粉泪”，就是这个时期词作内容的形象概括。可以说，这个时期的词，基本上仍然是以歌妓舞女为中心——词的创作主要是供她们歌唱，词的内容主要是反映她们的思想和生活，风格纤艳柔脆，有些作品甚至是淫秽之作。

直到苏轼出来，才如旱天惊雷，震撼词坛。他一扫五代遗风，使词的创作发生了一个伟大的变革。他把词从绣幌舞筵、从个人的小天地引向整个社会，扩大了词的境界，改变了词的柔靡风格，大大增加了词的表现力。他不仅用词写景抒情，还用词发议论、谈哲理，甚至还以词代替书信。吊古，纪游，言志，抒怀，思乡，怀人，悼亡，留别，送别，记事，记梦，咏物，题赠，唱和，等等，几乎所有诗的传统题材，在他的词中都能看到；从社会生活，到个人日常起居的思想感情，一切所见所闻所遇所感，他都可以写入词中。清人刘熙载说：“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事不可入，无意不可言也。”并非夸张之论。特别是他把社会生活引入词中，为词的内容开辟一个新的广阔的天地，直接影响了后代无数作家，尤其具有重大意义。钱塘江潮的奇伟壮观和弄潮儿的矫健形象，密州出猎的壮丽场面和作者杀敌报国的雄心，农村人民的生活图景，对祖国河山、对英雄人物的热情颂赞和壮志未酬的慨叹，这些内容，在靡靡之音仍然占统治地位的北宋词坛，使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相反，描写男女情事的作品，在三百四十多首苏词中，总共只占四五十首，已退居非常次要的地位。这是词自产生以来，从来没有出现的情况。

苏轼把议论引进词中，这是他的一个功绩。比如《水调歌头》中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十分精彩。

在苏轼以前，词被视为“小道”，地位不高。“文章豪杰之士，鲜不寄意于此者，随亦自扫其迹，曰谗浪游戏而已也。”写了词不愿留存，要“自扫其迹”，好像是不光彩的事。苏轼以一代文宗，大量写词，这就提高了词的身价，使它取得了同诗一样的地位，词的创作越来越繁荣。专门以词闻名的作者，在苏轼以前不多，苏轼以后则指不胜数。宋词的成就高出同时的诗、文，成为宋代文学最杰出的代表，与唐诗并列，这同苏轼的创作有着直接的关系。

苏轼性格豪放，思想旷达，学识丰富，闻见广博，才华横溢。这些因素，使得他的词雄奇瑰丽，热情奔放，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表现出鲜明的个性。无论是写景、抒情、叙事，他都能做到意新、境新、词新，天地万物，经史子集，口语俗谚，无不任其驱使，又有一股雄放不羁的气势贯注其间，如江河奔流，一往无前，因而把前人和同时代的人远远抛在后边，使人读之，顿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慨。宋代的词，无论婉约派，还是豪放派，虽各有各的风格特点，但各家之间，往往又有一些相近相似之处，界限并不那么截然分明。只有苏轼和辛弃疾，却如巨岳柱尺，迥非他人能仿佛于万一。苏、辛虽同为豪放词人，而“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王国维《人间词话》），风格也并不相同。个性，正是苏词强大生命力的源泉。宋代王灼云：苏轼词“高处出神入天，平处尚临镜笑春，不顾侪辈”（《碧鸡漫志》），王若虚云：

“公（苏轼）雄文大手，乐府乃其游戏，顾岂与流佑争胜哉？盖天资不凡，辞气豪迈，故落笔处皆绝尘耳”（《滹南诗话》，清代王士慎说：“山谷云：东坡书挟海上风涛之气，读东坡词当作如是观”（《花草蒙拾》），近代王运鹏说：“唯苏文忠（即苏轼）之清雄，亘乎軼尘绝迹，令人无从步趋。盖霄壤相悬，宁止才华而已！其性情，其学问，其襟抱，举非恒流所能梦见！词家苏、辛并称，其实辛犹人境也，苏其殆仙乎！”（《半塘遗稿》）都是讲的这个特点。

应当指出的是，这个特点不仅体现在他描写社会生活、抒发个人感慨以及赠别念远的作品里，也体现在某些写男女事情的作品中。那首千古绝唱的悼亡词《江城子》不用说，就是写男女恋情的另一首《江城子·孤山竹阁送述古》的“漫道帝城天样远，天易见，见君难”，《少年游·润州作，代人寄远》的“去年相送余杭门外，飞雪似杨花；今年春尽，杨花似雪，犹不见还家”，这些句子，也都感情激越，笔势流走，与周、姜等人写男女之情的作品，很不一样。

当然，苏轼也写过一些清新婉丽的作品，前人早已指出，这些作品的艺术成就，绝不在柳永、周邦彦、秦观等婉约派诸大家之下。

读苏轼的词，还会有一个突出的感觉：他的词是从内心自然“流”出来的，而不是“做”出来的；体现的是自然美，不是雕琢美。他曾说：“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矣。”他不是苦吟派，其作品如行云流水，无半点呆板相。苏轼同李白一样，感情极丰富，心胸极坦荡，最不隐瞒自己的思想感情。

在政治上是如此，即使因此而外放、遭贬，始终不改初衷。在文学创作上也是如此：想到什么就写什么，怎么想就怎么写，没有半点顾忌和矫饰。在中国文学史上，能做到这样的作家并不多，非天才杰出者，根本无法达到如此境界。他在赴汝州途中，在泗州塔下沐浴，写了两首《如梦令》，借别人给他搓背为由，以禅寓意，发了一通牢骚，说他“无垢”。这样的题材，“正经”的作家，大概是不会写的。这样任情挥洒，“不择地而出”，不怎么考虑“文章作法”，并不是说苏词不讲究篇章结构、文字凝炼，而是说，因为他性格豪迈，加以才气过人，无论写景、抒情、叙事，往往信手拈来，便成绝唱。此即元好问说的“东坡圣处，非有意于文字之为工，不得不然之为工也”，此与周邦彦、姜夔等人之搜索枯肠、精雕细刻，简直有天壤之别。正因为苏词是性情的流露，具有一种天趣，个性特别鲜明，非任何人所能模拟，所以清人陈廷焯说：“太白之诗，东坡之词，皆是异样出色，只是人不能学，乌得议其非正声。”王国维说：“无二人（指苏轼、辛弃疾）之胸襟而学其词，犹东施之效捧心也。”这话可以说极有见地。

在苏轼词中，还有一种非常可贵的东西：始终响彻着乐观主义的声音。苏轼一生，虽然大部分在政治失意中度过，但他以顺处逆，在艰苦的劳动生活中，在文学创作中，在朋友交情中，在大自然中，去寻找自己的世界，“一蓑烟雨任平生”，始终乐观。

定风波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

狷，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

莫听穿林打叶声，
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
山头斜阳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
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轼作品中，催人自强的爽健歌曲，体现执着生活、旷达乐观性格的作品，随处可见。

浣溪沙

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西流。

山下兰芽短浸溪，
松间沙路净无泥，
萧萧暮雨子规啼。

谁道人生无再少？
门前流水尚能西，
休将白发唱黄鸡。

“休将白发唱黄鸡”，这是不服衰老的宣言，这是对生活、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这是对青春活力的召唤。

前面曾提到凝炼的小文《记承天寺夜游》，苏轼在黄州期间，还有一首《西江月》词，其小序叙事简洁，描写生动，短短五十四字，即写出地点、时间、景物以及词人的感受，充满了诗情画意，是一篇写得很优美的散文，可与《记承天寺夜游》相媲美。

西江月

顷在黄州，春夜行蕲水中，过酒家饮，酒醉，乘月至一溪桥上，解鞍，曲肱醉卧少休。及觉已晓，乱山攒拥，流水锵然，疑非尘世也。书此语桥柱上。

照野弥弥浅浪，横空隐隐层霄。

障泥未解玉骢骄，

我欲醉眠芳草。

可惜一溪风月，莫教踏碎琼瑶。

解鞍欹枕绿杨桥，

杜宇一声春晓。

苏轼曾说：“未有天君不严而能圆通觉悟者。”他在黄州期间，开始研究佛家和道家思想。佛道解脱始于心灵的自律，要得到精神的宁静，必须先克服恐惧、愤怒、忧愁等情绪。苏轼潜心于灵魂的奥秘。他还练气功、打坐。到黄州之后，苏轼除了勤读佛经，还在道观中闭关了四十九天，他的一首诗中提到他在临皋亭炼丹的事。他给朋友王巩、张方平等人和

给苏辙的许多书信中，都曾提到过练功修行的感受。

一封给张方平的信中，他介绍自己的修行法，内容如下：

“每夜以子后披衣起，面东若南。盘足叩齿三十六通。握固闭息，内观五脏，肺白肝青脾黄心赤肾黑。次想心赤为火，光明洞澈，下入丹田中。待腹满气极，即徐出气，惟出入均调，即以舌接唇齿，内外漱炼精液，未得咽。复前法团息内观。纳心丹田，调息漱律，皆依前法。如此者三。津液满口，即低头咽下，以气送入丹田。须用意精猛，令津与气谷谷然有声。径入丹田，又依前法为之。凡九闭息三咽津而止。然后以左右手热摩两脚心，及脐下腰脊间，皆令热彻。次以两手摩熨眼面耳项，皆令极热。仍案捉鼻梁左右五七下。梳头百余梳而卧，熟寝至明。”

苏轼直到老还在寻找炼丹的方法，不过他对人长生不老的问题始终保持相当的理智。他曾说除非见到真正长生不老的人，否则各种有关仙人的传说都只是传说而已。他由古书上摘取了几条生活规则来作为简化生活的常识观，他写道：

1. 无事以当贵
2. 早寝以当富
3. 安步以当车
4. 晚食以当肉

夫已饥而食，蔬食有过于八珍。而既饱之余，虽刍豢满前，惟恐其不持弃也。若此可谓善处穷矣。然而与道则未也。安步自佚，晚食为美；安以当车与肉哉。车与肉犹荐于胸中是以有此言也。

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在黄州，他有田要种，有风景要欣赏，有佛经要读，有丹要炼，有酒要喝，有诗词要作，是颇不寂寞了，不过，他做一切事情，都离不开脾气相投、患难与共的朋友，他的诗词文，若少去赠友的内容，也就少了许多光辉。

下面两首赠友词中，就充满了友情的光辉。

满庭芳

有王长官者，弃官黄州三十三年，黄人谓之王先生。因送陈慥来过余，因为赋此。

三十三年，今谁存者，
算只君与长江。
凛然苍桧，霜干苦难双。
闻道司州古县，
云溪上、竹坞松窗。
江南岸、不因送子，
宁肯过吾邦？

摐摐，疏雨过，
风林舞破，烟盖云幢。
愿持此邀君，一饮空缸。
居士先生老矣，
真梦里、相对残缸。
歌声断，行人未起，
船鼓已逢逢。

定风波

王定国（王巩）歌儿曰柔奴，姓宇文氏，眉目娟丽，善应对，家世住京师。定国南迁归，余问柔：‘广南风土，应是不好？’柔对曰：‘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因为缀词云。

常羡人间琢玉郎，
天教分付点酥娘。
自作清歌传皓齿，
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年愈少，
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
试问岭南应不好？
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王巩字定国，因受“乌台诗案”牵连，被贬宾州（今广西宾阳县南）监盐酒税，宾州当时属岭南地区，僻远荒凉，生活艰苦。王巩赴岭南时，歌女柔奴同行。三年后（元丰五年即1082年）王巩北归，到苏轼处，柔奴出来劝酒，苏轼作此词。

到元丰六年（1083年）时，皇帝似乎开始后悔对反对派的责罚，李常回到京师，连王巩也获赦回到北方，苏轼正要定下心来快快乐乐隐居，过“淡而有味”的生活，却突然被调离谪居地，再度卷入政治纠纷中。

第五章 东飘西荡

元丰七年（1084年）三月，有消息传到苏轼耳中，他被调到汝州任职。据说皇帝本想叫苏轼掌史馆，但四周有人极力反对，最后他亲笔下诏，把苏轼的谪居地由黄州移到汝州（临汝），离京师较近，是居住的好地方。

苏轼逃避这道派令，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殆似小儿延避学”。调职的消息传来的两天前，三月三日，苏轼还在定惠院后山的商氏园内和朋友们欢聚，喝酒聊天。调职令来之后，他犹豫了好几天，不知道该不该申请留居黄州。后来想到新派令是皇帝的好意，决心服从命令，抛下东坡的农庄。

苏轼多年的辛劳即将一笔抹煞，他造的房屋，他开垦的农田，他种的菊花和茶树，都不可能带走，他不得不又在别的地方另辟一个“农场”。虽然苏轼是在十分窘迫的情况下接受调职，他的敌人们还是很不安。苏轼的名声太大，他的文名与诗名令太多的人知道他，他的官职微小，但他的敌人总对他如临大敌。

苏轼接受调职，上表给皇帝表示感谢，神宗看完苏轼的折子后，对朝臣说：“苏轼真是天才。”

这时就有人又想挑苏轼的毛病，他向皇帝奏道：“我认为

苏轼仍在发牢骚。”

皇帝惊问道：“何以见得？”

“苏轼用了‘惊魂未定，梦游縲绁之中’等字句，又提到他兄弟二人曾通过特别考试。意思是说他们凭策问通过考试，现在却为批评朝政而受罚，这不是在责怪皇上吗？”

幸亏皇帝还算清醒，他说：“我了解苏轼，他心里是没有坏意的。”

这样才令小人们闭了嘴。

苏轼到黄州，原是以待罪之身来过被羁管的囚徒日子的，但颇得长官的眷顾，居民的亲近，加以由于他性情达观，思想通脱，善于自解自慰，变苦为乐，却在流放之地寻到了无穷的乐趣。他寒食开海棠宴，秋江泛赤壁之舟，风流高雅地徜徉了五年之久。一旦言别，岂能不牵心挂肠于此地的山山水水和男女老幼？更何况这次虽是从遥远的黄州调到离京城较近的汝州。但五年前加给他的罪名并未撤消，官职也仍是一个“不得签书公事”的州团练副使，政治处境和实际地位都没有任何实质上的改变。因此，苏轼心中没有任何欣喜之感。他这一年已四十八岁，在二十多年的宦海生涯中，由于政治上的风云变幻，他不断地西去东来，南迁北徙，尝够了人生的苦味。当此再一次迁徙之际，政治牢骚与思乡之情交织在他心中，使他思绪万千，心潮难平。不过苏轼毕竟是豪放旷达之士，他不愿、也绝不会在牢骚与哀愁中沉沦下去。苏轼复杂的情绪，在他临行前告别黄州父老的一首词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元丰七年四月一日，余将去黄移汝，留别雪堂邻里二三君子，会李仲览自江东来别，遂书以遗之。

归去来兮，吾归何处？
万里家在岷峨。
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
坐见黄州再闰，
儿童尽、楚语吴歌。
山中友，鸡豚社酒，
相劝老东坡。

云何，当此去，
人生底事，来往如梭。
待闲看秋风，洛水清波。
好在堂前细柳，
应念我，莫剪柔柯。
仍传语，江南父老，
时与晒渔蓑。

苏轼决定先到高安看望弟弟苏辙，他让长子苏迈带全家人去九江等他。有三个朋友决定送他去九江，一个是前面曾提到过的陈瓘；一个是比他小五岁的和尚参寥，他们在徐州认识，参寥曾到黄州陪他住了一年左右；还有一位道士乔同。

苏轼陪参寥到著名的庐山玩了几天，写了几首咏庐山的诗，其中一首，成为描述此山特色的最佳作品。

题西林壁

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此诗不以描写瑰丽的景色取胜，也不以抒发强烈的激情感人，而是着墨素淡，不事雕饰，在浅显朴实的语言中深含哲理，启人思想，耐人寻味，从而博得万口争诵，千古流传。它为我们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哲理：凡是局内人往往不容易看清事物的全貌和实质。这就为我们防止主观主义提供了生动而有力的借鉴，要求我们不断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善于从不同角度观察问题，从不同方面考虑问题。这是诗中所展示的重要思想意义，也是今人一致肯定这首诗的原因。

苏轼去弟弟那儿住了六七天，然后乘船去九江接家人。他带家人下长江，九月抵达金陵（南京）。朝云为苏轼生的儿子，叫遁儿，在十个月大时不幸夭折，苏轼和朝云都十分伤心，尤其对朝云来讲，这是个很大的打击，苏轼在一首悼亡儿的诗中说：“我泪犹可拭，母哭不可闻”。后来朝云没再生过孩子。

到南京后，苏轼去看王安石，王安石现在已是体弱多病的老人。双方都是大诗人，佛教信仰者，在一起谈诗论佛，也有不少话可说。不过，谈到国事和新政时，他们的意见仍不一致。

苏轼到达富庶的江苏盆地，顿时爱上了该处的美景和气氛，在由南京到靖江的路上，他一路计划着买地置田。他认

为，皇帝可以把他由黄州调离，也同样可以把他调离汝州去居住别处，所以，每到一地他就寻找晚年养老所在。他的朋友们纷纷提供意见。仪真的太守来邀苏轼同住，他同意暂时将家人安顿在仪真学府中。仪真在长江以北，靠近南京。

苏轼的好朋友滕元发在南岸湖州任太守，他劝苏轼住在常州市太湖左岸的宜兴。他们想出一个主意，由苏轼在宜兴买田，然后上表请求住在该地，就说农庄是他惟一的谋生本钱。滕家的一个亲戚在宜兴城外二十里的深山中有一处田庄，每年可产八百担米，苏家可以凭此衣食无忧。苏轼托朋友卖掉他父亲在京师留下的住宅。

九月他一个人去看那间村舍，“吾来阳羨（宜兴），船入荆溪，意识豁然，如惬平生之欲。逝将归老，殆是前缘。吾性好种植，能手自接果木，尤好栽桔。阳羨在洞庭上，柑桔栽至易，得当买一小园种柑桔三百。元丰七年（1084年）十月二日于舟中。”

现在苏东坡完成了一笔交易，旁人看来会觉得他很傻或者很厚道，这完全是看法的问题。他写信给滕元发，说他要到荆溪边找房子，果然找到了。他和朋友邵民瞻出去，找到一栋很好的老宅，花五百缗买下来。现款几乎全花光，但是苏东坡很高兴，打算回来带着属搬进新居。有一天他和邵民瞻月夜到村中散步，经过一栋房子，听到女人的哭声。苏东坡和邵民瞻敲门进去，一个老太太在屋角哭泣。两人问他怎么回事，老太太说：

“我有一栋祖传一百多年的房子。逆子不肖，把它卖给别人。今天我只好搬出一辈子相守的老宅——我哭的就是这件

事。”

“你的房子在哪儿？”苏东坡很感动。

出乎意料之外，他发现老太太说的竟是自己花五百缗买来的房子。他拿出卖契，当着老太太的面烧掉。他第二天把他儿子叫来，要他让老母搬回故屋，没有逼他退钱。她儿子是把钱用来还债，还是有别的原因不能还钱，我们不知道。于是苏东坡两手空空回到城里，房子没买成，钱又少了五百缗。但是他一时起了善心，无法抗拒，也顾不得自己家人了。这是一件好事——一件好事，如此而已。

由常州回来，他十月上表给皇帝，请求住在该区。不过没有批准之前，他得向指定居地进发，汝州在京师西面，要走五百里左右。他带一大家人向京师走，慢慢行进，希望表状获准，他不必要来回花路费。朝廷没有音讯，他只好勉强到京师。照他的诗篇看来，全家人连饭都吃不饱。来到泗州淮河边，他给朋友的诗至少有三首提到饥饿。有一首自比为饥鼠，整夜啃咬东西。太守送东西到船上，孩子们哭声震天，一家人似乎走不动了，他决定再度上表，并且在南都张方平家中住，等皇帝的回音。

第二封哀诉是在泗州写的，部分内容如下：

“但以禄廩久空，衣食不继。累重道远，不免舟行，自离黄州，风涛惊恐。举家病重，一子丧亡。今虽已至泗州，而费用罄竭，去汝尚远，难于陆行，无屋可居，无田可食，二十余口不知所归，饥寒之忧近在朝夕。与其强顾忍耻，干求于众人，不若归命投诚，控告于君父。臣有薄田在常州宜兴县，粗给啜粥。欲望圣慈许于常州居住……”

旅途中发生了两件有趣——也可以说不幸的事。他在泗州曾渡江到南山去玩，江上有一座长桥，泗州处于战略要地，天黑之后谁也不许过桥，违令者要处以极刑。但泗州太守不惜违规，晚上陪苏东坡过桥。苏东坡曾写词为记：

“长桥上灯火闹，使君还。”

太守姓刘，是一个简朴、诚实的山东人。他第二天读到苏东坡的诗，吓得心都快跳出来了。他赶忙到船上去找苏东坡，“我刚读到你的诗，问题很严重，太严重了！你闻名全国，这首诗一定会传到朝中。普通老百姓晚上过桥要罚两年的苦役。太守犯法，只会更重。我求你千万别让其他人读到这首诗。”

苏东坡懊悔不已，笑笑说：“老天爷！我一开口便是罪，岂在苦役二年以下。”

他住在张方平家遇到一件叫人感慨的事。主人设宴款待他，席间他认出张方平儿子的侍妾就是前黄州太守的宠妾。她叫胜之，太守当初最宠爱她。太守是苏东坡的好友，不幸亡故，她只好改嫁到张方平家。东坡看着这位佳丽风姿不减当年，在席间谈笑风声，心中不免感慨万千，想人生变幻无常，想起他的许多故友，不禁眼睛润湿，喉咙哽咽。胜之觉得苏东坡如此善感，却不解其中酸涩滋味，只觉得很有趣，忍不住笑出来，转头又向他人说话闲聊去了。苏东坡觉得很不愉快，事后曾劝告朋友能不纳妾便不纳妾，否则黄州太守的宠妾胜之就是例子。

皇帝病了，三月一日他的母亲——英宗太后开始摄政。三月五日皇帝驾崩，第二天朝廷就降旨准苏东坡暂住在湖泊区。

这个消息对苏轼非常重要，如今他如愿以偿，计划也决定了。于是一家人又搬回常州宜兴县。元丰八年（1085年）四月三日离开南都。五月二十二日抵达宜兴县的新家。

苏轼相信他终于可以定居一生了。“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他要在安详优美的环境中欢度余年。他可以乘小舟来来去去，“神游八极万缘虚。”

一切全是命，定居的计划刚刚实现，复官的消息又来了。他到宜兴才十天，就听说他被任命为登州（今山东文登县）太守。他听到京师的传闻，却不愿相信，他认为京师一向充满谣言，最近四月十七日的官报并未提及此事。

苏东坡心乱如麻，衷心讨厌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几天后官方派人来到，证实了这一消息。全家人欣喜欲狂，简直不敢相信是真的。但苏东坡却从心中看淡了这一切，他在一首诗中自比是颠峰已过的良驹，“青云飞步不容攀”。另一首诗说：“南迁欲举力田科，三径初成乐事多。岂意残年踏朝市，有如疲马留陵坡。”他在给谈经论禅的朋友佛印的信中说自己有“如蓬蒿藜藿之径”，给米芾（米元章，宋代大书法家）的信中则说：“某别登卦都，已达青社。衰病之余乃始入闹，忧畏而已。”

然而他还是接受了官职。太后正在改变着局势，司马光被任命为门下侍郎，相当于副宰相。他上任时，太后派武装卫士到他家直接“护送”他到公署，怕他接到圣旨不肯赴职或拖延时间。

苏东坡六月动身，前往山东海岸的登州。他们由胶州附近走海路、乘船绕过山东半岛。于当年十月十五日到达登州，

五天后又奉诏赶往京城。一家人又开始奔波上路。元丰八年（1085年）十二月抵达京师。

在朝中，苏东坡经常得到太后的庇荫。仁宗皇后在审讯中救了他一命。如今英宗皇后又提拔他升上高位，晚年若不是另一位太后——神宗皇后摄政，他也许会在海外流放至死。

新皇帝年方九岁，由祖母摄政。幸亏宋朝代代有贤明的皇后，汉唐两代，有的皇后篡位，让宦官和外戚得势，也有皇后造成宗室的衰亡。然而苏东坡生活的宋代，他经历的四位皇太后都很贤明，有些十分可取。神宗皇帝一死，太后就马上让司马光复位，扭转政局。王安石变法的一切法令措施都暂停或废止。元祐之治开始了。

苏东坡进京入朝后，迅速升迁。他到京师八个月，官位升了三回。根据古制，官分九品。短短的几个月，苏东坡由七品官升到三品官，居翰林院，负责起草诏书，时年四十九岁。

当初，差役法实行长久后产生了流弊。编户充当役夫的人不习惯服役，役头又用暴虐的方法役使他们，造成编户大量破产。王安石做宰相后，改差役法为免役法，使编户按等级的高低出钱雇用役夫，执法的人常常超过标准索取，成为人民的祸害。司马光做宰相后，认为免役法带给百姓很大灾害，就想恢复差役法。他派遣官员去筹备设置机构，苏轼也被派参与了这项工作。苏轼一分为二地看到，免役法其实也有有利的一面，而差役法的弊端也很大，于是，他对司马光进言，说：“差役法和免役法，各有利弊。免役法的流弊，在于聚敛百姓的钱财，以致十室九空，上面聚敛了很多钱财，下

面给人民带来了钱荒的灾难。差役法的流弊，在于人民常在官府服役，不得专力农耕，而贪婪残暴的官吏和奸猾的差役得以借此做坏事。这二种役法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其轻重大概是相等的。”司马光说：“那么，以你看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办呢？”苏轼说：“一切政策法令，前后应该互相衔接，这样才容易成功。做每件事情，一点一点地逐步进行，那么百姓就不会受到惊扰。夏、商、周三代的办法，是士兵和农夫合而为一，到秦王朝才开始一分为二，到了唐朝中叶，又把府兵制改成了募兵制，士兵一生都在军队里。从那时以来，民是民，兵是兵，农民拿出粮食和布帛来养兵，士兵冒着生命危险来保卫百姓，天下人民都感到方便。我认为即使圣人再出，他也不会改变这个办法。如今的免役法，其实和上面所说的差不多。明公您现在想骤然取消免役法，以差役法代替，就正像要取消常征的兵而恢复民兵，这只怕不太容易吧？”司马光不以为然。苏轼又把这些在政事堂上陈说，令司马光十分不高兴。苏轼说：“从前韩琦指责陕西义勇，您做为谏官，据理力争，韩琦也很不快，您并未在意。您从前曾详细对我讲过这个故事，难道您如今做了宰相，反而不允许我把话讲完了吗？”司马光笑了。

不久苏轼被任命为翰林学士。

哲宗二年（1087年），苏轼兼侍读。他每次进宫侍读，当读到治乱兴衰、邪正得失的时候，总是反复开导，希望皇帝得到启发有所领悟。哲宗皇帝年仅十岁，他虽然恭默不语，但总是点头肯定苏轼的看法。他们曾经拜读祖宗《宝训》，因而涉及时事，苏轼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进行分析，说：“现在是赏

罚不明，善与恶没有人勉励和阻止，如黄河的水势正向北方流，却要强迫它向东流；西夏入侵镇戎（今宁夏固原），屠杀和掳掠了几万人，统兵的主帅却不把消息报告朝廷。长此以往，我担心会逐渐造成衰乱的加剧。”

苏轼任翰林，常闭门锁居禁宫中，在此期间他起草了八百多条诏命。这些诏命都收在苏轼的全集中，文辞优美、恰当、精确。圣诏的措辞通常引用众多史例与掌故，苏轼灵活地应用它们。他死后，另一位学士接替他，此人很为自己的文采自得，他曾问一个伺候过苏轼的老仆人，他比苏轼如何。老仆人回答：“苏轼的文采也许不及大人吧——不过他从来不翻书作文。”

苏轼对政客小人的嫉妒十分厌恶，他曾多次请求免去翰林官职。有一天苏轼坐在堂中，太后召他入宫，小皇帝哲宗坐在祖母身边。苏轼起草完吕大防拜相的诏书，宣仁皇后突然问他：“你以前是做什么官？”

苏轼答：“臣是常州团练副使。”

宣仁皇后又问：“你现在是什么官？”

“臣现在是待罪翰林学士。”

“你怎么会从团练副使这样迅速地升做了翰林学士呢？”

“因为太皇太后的恩典。”

“不是。”

“是因为皇帝陛下的鸿恩。”

“也不是。”

“那么是其他大臣的推荐吗？”

“也不是的。”

苏轼沉默半晌，说：“臣再不懂规矩，也是不敢以非正当的方式进身翰林的。”

宣仁皇后终于说：“这是先帝的旨意呀！先帝每次读到你的文章，总是感慨地说：‘奇才！奇才！’，他有心重用你，只是还没有来得及就去世了。”

苏轼不禁失声痛哭，宣仁皇后和哲宗皇帝也哭了起来，左右的人也都个个感动得流出了眼泪。随后，宣仁皇后和哲宗给苏轼赐坐赐茶，苏轼离开时，太后还命太监取下御前的金莲烛，照着路送他归院。

元祐三年（1088年）这一年，苏轼五十三岁，在京任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学士。前一年司马光已死，苏轼因与司马光的争执，招致官员忌恨，他们不断对苏轼进行攻击。苏轼在朝廷中感到十分不适，他接连上书，称病乞请外任，但因为太皇太后的坚决挽留，他只好留在任上。

这一年冬天，苏轼任知礼部贡举，恰巧大雪纷飞，天气奇冷，考生们都坐在庭中，被冻得不能说话。苏轼放宽了原来那些严格的规定，让考生们能尽量发挥自己的才能。巡视考场的一些内侍们常常挑剔和侮慢考生们，还用了意思比较暧昧的词句，以此诬蔑考生们有罪。苏轼把这种情况统统报告了哲宗，赶走了这些讨厌的巡场侍们。

苏轼在京师买了一处住宅，靠近东华门，叫白巷，上朝很近。在京师的新生活与当年在黄州农庄的生活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他们一家已有十五年未在京师定居，现在除苏迈去江西任一个小官职之外，苏轼一家都在京师。苏轼的次子苏迨十六岁，幼子苏过十四岁，两个孩子和苏轼的夫人

王闰之与妾朝云生活在一起。

京师很繁华，但苏轼仍不忘继续练气功养生，他总是黎明即起，梳头一百次，之后稍躺一会儿，再去上朝。

做高官的乐趣，对苏轼而言似乎不大。他在一篇笔记中谈及苦与乐，他说：

“乐事可慕，苦事可畏，皆是未至时心尔。及苦乐既至，以身履之。求畏慕者初不可得况，既过之后复有何物。此之寻声捕影系风迹梦尔。此四者犹有仿佛也。如此推究，不免是病，且以此病对治彼病。彼此相磨安得乐处。当以至理语君，今则不可。元熈三年八月五日书。”

如今苏轼的名气达到最高峰。文人朋友都崇拜他，又享高官厚禄。他为请议所受的苦远超过任何人，因此备受推崇。司马光死后，他成为当代第一学者。他没有当宰相，但大家公认他的声望高于众官。

苏轼也回到了京师，元熈元年（1086年）开始担任御史中丞，次年升为尚书右丞。受“乌台诗案”牵连，苏轼几位流放南方的朋友如今也都官居要职，包括王诜驸马、王巩等在内。他在黄州的老朋友陈瓘也来京师探望他。几年前和苏轼通信的黄庭坚也来见苏轼，正式拜在他的门下。多年来苏轼在信中曾一再称赞四学士，大大提高了他们的名声，大家公认，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是“苏门四学士”，后来又加了李荐和陈师道两人，成为“苏门六学士”。

学者章元弼很崇拜苏轼，他相貌平常，却娶了一个美貌的妻子。他太太在婚后发现他整夜读苏轼的词文，不理她，一段时间后终于忍无可忍，对章元弼说：“原来你爱苏轼胜过爱

我!”他们终于离了婚。后来章元弼对朋友说,他们夫妻反目,全是因为苏东坡。苏轼的魅力真可谓大矣。

苏轼大受欢迎,许多文人甚至仿戴他的帽子。他戴的帽子特别高,顶上窄窄地向前弯,后来成为著名的“子瞻帽”。有一次苏轼陪皇帝去醴泉看戏,有个角色在台上戴了这种帽子,他吹牛说:“我的作品比你们的强多了。”另外的演员问:“何以见得呢?”这人便说:“你没见我戴的帽子吗?”看到这儿,所有观戏的人都忍俊不禁,皇帝还特地转头看了苏轼一眼。

苏轼时常怀念黄州的生活,他的一首《如梦令》小令,仅数十字,却深刻表达了他的殷殷思念之情。

如梦令

为向东坡传语,人在玉堂深处。

别后有谁来?

雪压小桥无路。

归去,归去,

江上一犁春雨。

我们曾多次提到苏轼在人们心中的亲切之感,甚至他的日常生活,也在民间流传着许多小故事。同样是思乡,他的词饱含了情感,而有关的小故事,却令人捧腹。

据说苏轼曾经对钱勰称他喜欢以前乡下的简朴生活。他说他们晚餐只有白饭、萝卜和清汤,他却十分快乐,十分满足。有一天钱勰下帖子请他吃饭,帖子上说:“将以三白待客。”

苏轼没有听说过“三白”，不知道是什么美食，于是他带着好奇欣然赴宴，结果钱勰只准备了三样东西：一撮盐、一碟生萝卜、一碗白饭。苏轼想起自己说过的大话，知道被愚弄了。苏轼不动声色，过了一段日子，他下帖子给钱勰，请对方吃“三毛”宴，钱勰赴宴，发现桌上空空如也。苏轼请钱勰入座，两人对坐半日，过了很久也没有菜上来，钱勰终于忍不住，说肚子饿了，苏轼郑重其事请朋友快吃三毛（没。没与毛音近），“盐也毛（没），萝卜也毛（没），饭也毛（没），非三毛而何。”

还有个故事，说有一次一个籍籍无名的学者来拜访苏轼，他带着一册诗，想征询苏轼的意见。这个人朗诵了他自己的作品，音调抑扬顿挫，之后，他面露得意之色，问苏轼，“大人觉得鄙作如何？”

“可得十分。”苏轼说。

此人忍不住快跳起来了，苏轼却又加了句注解，“诗有三分，吟有七分。”

苏轼为官多年，他在策论中不断提出“独立思考”和“公正无私”是好大臣的重要条件，但这两条正是党人最不喜欢的。有一次饭后，苏轼在房内踱来踱去，他心满意足地捧着肚子，问房中的人，他肚内藏了些什么，一个侍儿说：“满腹文章”，一个侍儿说：“满腹思想”，还有一个说是“满腹经纶”，最后朝云说，“学士一肚子的不合时宜”。苏轼大笑，说：“对！”

中国艺术史上有一次大盛会，十六名学者齐集在王诜驸马的府邸，这就是“西园会”。这次盛会有李龙眠作画留念，

米芾详细描写。在场的有宋朝三大画家苏轼、米芾、李龙眠，还有苏辙和苏门四学士等人。石桌列在高杉巨竹之下，顶上有瀑布流入大河，两岸都长满花卉和修竹。王诜的两位侍妾梳高髻戴发饰，站在桌子后方。苏轼一身黄袍黑帽，正倚桌写字，王诜坐在附近看他，另一张桌子上，李龙眠正在题一首陶潜的诗，苏辙、黄庭坚、张耒、晁补之都围桌而立。米芾仰着头在附近一块岩石上刻字。秦观坐在树根上听人弹琴，其他人则散到四方，有跪有站，姿态各不相同。那些人中有和尚与学者。

苏轼的天才和灵性蕴育出一种新型的国画，尤其适合表现毛笔的韵味。苏轼最重要的消遣便是“玩墨”，他伟大创新的艺术冲动借此得到自由的发挥，也给中国艺术带来永恒的影响。苏轼不但创造出有名的“墨竹”，还发明了新型的国画“士人画”。他和后辈米芾共同探索新画法，后来竟变成中国绘画最独特、最具代表性的风格。

一切绘画都不知不觉反映出一种思想。国画中不知不觉表现出天人合一、宇宙生命一统、人类只是渺小过客的观念，由此看来，所谓写意的国画，无论画的是一竿修竹、一组怪石、山中烟雨或水上雪飞都是泛神爱的表现。苏轼在朋友家的墙壁上画了一幅竹石，曾写诗为记。他的诗很清楚地描绘出画家物我合一的态度。

空肠得酒芒角出，
肝肺搓牙生竹石。
森然欲作不可留，

写向君家雪色壁。

诗画合一，可谓珠联璧合。因画作诗，可互为生色，而诗中如画，又是一种境界。

醉落魄
离京口作

轻云微月，二更酒醒船初发。
孤城回望苍烟合。
记得歌时，不记归时节。

巾偏扇坠藤床滑，
觉来幽梦无人说，
此生飘荡何时歇？
家在西南，常作东南别。

这首小词，表现的是酒醒后突然涌上心头的瞬间感受。

月色微微，云彩轻轻，是二更了吧？词人从沉醉中醒来，听着咿咿呀呀的摇橹声，船家告诉他，刚开船呢。从船舱中往回望，只见孤城笼罩在一片烟雾迷蒙之中。这一切仿佛在做梦一样。只记得饮酒高歌时的情景，怎么又回到船上来了呢？真是月朦胧，云朦胧，孤城朦胧，人的意识也朦胧。一切都融化在轻柔朦胧的月色之中了。景和情的和谐，巧妙地烘出了醉醒后的心理状态。

下半阙紧接上半阙，描写醉后的形态：头巾歪在一边，扇

子坠落在舱板上，藤床分外滑腻，仿佛连身子也挂不住似的。中国画讲究传神，中国诗也讲究传神。“巾偏扇坠藤床滑”，短短七个字，就将醉态刻画得维妙维肖。

世上有晋身之道，也有自退之道，苏轼专门从事于后者。现在苏轼不追求政事，却为政界所追逐，实在是一个有趣的现象。王安石当权，他在政界失败还不为奇，他自己的党人得势，他仍然“不成功”，可就令人吃惊了。苏轼向来不是好党人，因为他做人的格调太高。同党当道，他自己又享盛名和高位，连太后都佩服他，他却一直想放弃这个受人羡慕的官职。他没有立刻如愿，不过凡是知道苏轼脾气的人都可以看出，他不会永留政坛。延年术的第一道法则就是避免一切情绪干扰，而苏轼对政坛他所谓的“奸小之境”却有不少情绪的纷争。政治游戏，他缺乏跻身公卿的决心，如果他个性稍微改一改，升官并非难事，他身为翰林学士知制诰，有机会和皇族亲近，只要他有心玩一手，凭他的智慧一定可以大大成功，但是这不合他的本性。

宋朝的官制特别容易造成党争。虽然元丰元年（1078年）朝廷曾改组官制，简化官制，仍然没有专责的宰相一职。内阁的连带责任并无明文规定，好让宰相和阁员成为一体。

官场之争有游戏规则，不幸苏轼并非遵守这些规则的典型，几年内他触犯了每一道作官成功的规则。朝云的儿子出世，他曾写出下列的愿望：

“惟愿孩儿愚且鲁，

无灾无难到公卿。”

小孩子夭折，没有机会实现父亲的愿望。

苏轼逃避政治，政治却在追逐他。他和司马光意见不合，但是他到京师半年，司马光就去世了。苏轼陷入显赫遭忌的地位。不久风暴向他袭来，朝廷的争斗立刻以他为中心。到了次年一月，有几十篇表状攻击他。司马光一死，政党就形成了——有理学家为首的“河北派”、“河南派”，和苏轼为首的“四川派”。由记载和苏轼的退意来判断，他根本不知道“四川派”是什么意思。但是政敌不放过他，一心要与他狠斗。

元熈元年（1086年）十二月中到元熈二年（1087年）一月十一日，朝廷收到四五篇弹劾苏轼的状子，一月十二日太后命朝臣不要再进言。那批人抗命，于次日又上表论奏。苏轼不想答辩，却四度上表请求离京。十六日太后在朝臣面前为苏轼辩护，甚至有意于处罚弹劾苏轼的人。

这时苏轼决定不求外放，要为这件事争斗到底。一月十七日他写了一封两千字的长信给皇帝，点明立场，责备政客小人。他维护允许意见不一的原则，他说：“若上之所可，不问其是非，下亦可之。上之所否，不问其曲直，下亦否之”，对国家并没有好处。君主和大臣应该互相提供意见，如果百官唯唯诺诺，就变成孔子所谓“足以丧邦”的跟屁虫了。然后他举出他和司马光对征兵问题的异议，他们看法不同，却尊重彼此的意见。现在司马光去世，这批人遵行他的政策，一心只想顺从君主。事实上，他认为司马光并不要求别人永远顺从他的意见，太后也不希望大家惟命是从。

最后朝廷在二十三日下令苏轼留任原职。二十七日，弹劾苏轼的官吏被赦免。

苏轼进退两难。太后支持他，政敌没有达到目的，反而

丢尽面子，他只好留任原职。为了报答太后的鸿恩，他决心更坦白、更直率，提出别人不敢说的意见。此后的两年中，他上交了不少策论和表状，争取能解决一些问题。议论发表得越多，他的反对派们自然越忌恨他，苏轼如同置身蛇窝中，一再请求之下，元熈四年（1089年）三月十一日终于如愿以偿，以龙图阁学士出任杭州太守，领兵浙西。浙西太守可以管辖六区，包括现在的江苏。

临行八十三岁的老臣文彦博特地来送他，劝他不要乱写诗。苏轼已经跨在马上，他大笑说：“我若写诗，有一大堆人正等着要替我做注解呢！”

元熈四年（1089年）七月苏轼抵达杭州，担任浙西军区钤辖兼杭州太守，时年五十四岁。他弟弟苏辙由户部侍郎升任吏部尚书，封翰林学士，那年冬天苏辙出使契丹，历时四个月。

苏轼运用太后的赏识，埋头苦干，足足一年半时间，他甚至无暇翻书。他要求朝廷拨款从事重要的改革，完成了供水系统、医院等公共健康和卫生措施，疏通盐道，重整西湖，平抑粮价，不顾朝廷和邻近各省官吏的漠视，一个人热心赈灾。

太守官署在杭州市中心，但苏轼经常在葛岭寿星院一栋幽静的小屋内办公，他在寒碧轩或雨奇轩内看公文，雨奇轩因他的西湖诗中“山色空濛雨亦奇”一句而得名。有些时候，他会去离城十余里的高山上办公，他叫随员带着旗帜和雨具走钱塘门，自己和一两个保镖乘船由涌金门穿过湖泊向西走，在普安寺用餐后，带几个文书到冷泉亭，一边谈笑一边完成

当天的工作，批决公文“落笔如风雨”，办完事和僚属喝一杯，傍晚再骑马回家。

苏轼尽力支援州学学士，他的举动使他备受百姓的欢迎。杭州城存在许多问题：官舍陈旧，军营漏雨，军备残破不堪，城门楼的屋顶可以望见天空。这些都是百年以上的建筑，是钱王时代建立的。前几任太守曾自筑新居，撤下旧房子。甚至曾有一栋房子倒塌，压死过人。苏轼特别向太后上书，要求拨款四万贯重新修筑官舍、城门、楼塔、谷仓，一共是二十七处场所。

杭州人口五十万，却连一家公立医院都没有。钱塘江口地带海陆游客荟集，很容易传染瘟疫。有几种药方相当灵验，苏轼令人用大字抄下药方，以布告方式贴在人口稠密处，以便让普通百姓也都知道。但苏轼对于这种零碎、没有组织的救病工作并不满意，他由政府基金拨出两千缗，自己又捐了五十两金子，在城中心众安桥建了一座公立医院，叫“安乐坊”，这也许是中国第一所公立医院。三年里曾有至少一千个病人看过病，后来医院搬到湖边，改名“安济坊”，苏轼离开后还继续看病。

但是苏轼最伤脑筋的是杭州居民的用水问题和穿过市区的运河淤泥，他请教专家，视察运河水位，订出一个阻止淤泥、清理整个运河区的计划。这是他在杭州的第一件工程，十月——他到任三个月后开始，次年四月完成。这套工程系统发生作用后，运河水深八尺，城内供水源源不断，疏通城内盐桥河的费用也免除了。

供水问题和运河交通一样重要，苏轼试行了不少措施，把

西湖的山泉引入城内。本来有六个水库分布在城中各区，但是净水干管常常损坏。十八年前苏轼到本区担任通判，曾协修干管，但是现在西湖布满水草，草根夹着淤泥，湖床不断升高。干管损坏，市民都喝带盐的水，不然就要花钱买湖水，每斗水要一文钱。苏轼请教以前曾监修干管的老和尚，得知干管由大竹筒接成，不能耐久，于是把干管全换成了陶制韧管，上下以石板保护。这是一个昂贵的计划，要接通长达几百米的陶管，由一个水库通向另一个水库。苏轼更进一步，把湖水引入北郊的两个新水库，供应军营用水。他身为军事统领，派一千名士兵工作，一切都办得妥妥贴贴。据说他完成这两个水库以后，杭州几乎每一个地区都可以用到西湖的清水。

由六个供水的小水库推展到全城，苏轼下一步自然要着手应付大水库——西湖的问题。在大众的想象中，苏轼和西湖今日的面貌仍有很大的关连，西湖使杭州得到“人间天堂”的美誉，西湖本身更是人类设计才华最完美的发挥。苏轼完成杭州的运河系统和城内的六个水库，马上开始整建西湖。小水库完成之前，苏轼曾在元夔五年（1090年）四月上书给太后，略述开浚西湖的种种理由，五月他又上书给门下、尚书、中书各省。他说，若不想办法，二十年后整个西湖都会堵掉，杭州人就没有清水可用了。

杭州的繁荣一向和供水息息相关。杭州建市起于唐朝，当时一位大臣开发西湖，使城中居民有清水可用。苏轼整建西湖之前，西湖不断缩小，到处盖着葑草。十八年前葑草占十分之二三的湖面，这次，葑草已覆满了半个西湖。由工程难

度来看，这是一件小事，只要清除野草就行了，这是轻而易举的工作，只是前任太守们没有想到。

苏轼的请求获准后，他开始招募几千名工人和船夫，动工修湖，仅用四个月就完工了。安置挖出来的野草和泥土又成为一个大问题，苏轼灵机一动决定用来建长堤。湖岸房舍密集，有不少富家别墅立在岸边，由南岸步行到北岸的人必须绕过两里的岸边，长堤是直线，无形中缩短了距离，又能变成美丽的漫步场所，这道长堤便是著名的西湖苏堤。堤上有六座拱桥，九座亭阁，苏轼生前人们把其中一座亭阁立做他的生祠，挂了他的画像，经常膜拜，追思他的功劳。

如何使西湖永远不生葑草也是一个大问题，苏轼把岸边的湖面开垦出来，给农夫种菱角，农夫自会定期负责除草工作。

苏轼又试行几道更大的计划：开发江苏运河系统；在苏州城外施行拖船驳运计划——日后开发阜阳的西湖，与杭州西湖异曲同工。有些计划没有实现，但是详实的设计和地图证明他具有工程方面的才干。

哲宗元祐六年（1091年），苏轼被召为吏部尚书，人还没有到达京师，又因弟弟苏辙被任命为右丞，所以又改授苏轼为翰林承旨。苏辙不接受右丞的官职，希望同哥哥一起充当从官，未被允许。

苏家两兄弟都位居高官，他们的政敌更是惊慌，对他们展开了猛烈的攻击，苏轼和苏辙一直争论该由谁出京，以使另一个人免受猜忌。苏轼决定出京，但苏辙说弟弟该让哥哥。苏轼一回京就遭到御史们的猛烈攻击，他更加想撤，于是献

上辞职信。

苏轼愈是要求离京，政敌们愈觉形势严重，他们甚至说苏轼上表辞职，是运用压力争取相位。苏轼五月二十六日抵京，仅在京师任上短短三月，八月五日，以龙图阁学士知颍州（今安徽阜阳）军州事。

在这段时间里，苏轼曾作一首词，是送给著名诗僧参寥的。参寥与苏轼肝胆相照，友谊甚笃。早在苏轼任徐州知州时，他专程从余杭前去拜访。苏轼被贬黄州时，他不远二千里，至黄与苏轼游从；此次苏轼守杭，他又到杭州卜居智果精舍；甚至在以后苏轼南迁岭南时，他还打算往访，苏轼去信力加劝阻才罢。

苏轼此词，以景语发端，议论继后，但融情入景，并非单纯写景。议论又伴随着激越深厚的感情一并流出，大气包举，格调高远。写景，说理，其核心却是一个情字，抒写出历经坎坷后了悟人生的深沉感慨。

八声甘州
寄参寥子

有情风万里卷潮来，
无情送潮归。
问钱塘江上，西兴浦口，
几度斜晖？
不用思量今古，
俯仰昔人非。

谁似东坡老，
白首忘机。

记取西湖西畔，
正春山好处，空翠烟霏。
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
约它年，东还海道，
愿谢公雅志莫相违。
西州路，不应回首，
为我沾衣。

元熹六年（1091 年）颍州收成不好，苏轼有机会看到长江以北乡村的情况，他在颍州八个月时间，看到灾民成群结队由西南向淮河北岸进发，农民撕下榆树皮，与马齿苋、麦麸一起煮着吃。流寇滋生，老弱倒在路边，年轻力壮的就加入盗匪行列。苏轼尽力救济灾民。

元熹七年（1092 年）二月，苏轼奉调扬州。他的长子在异地任职，他带小儿子参观途中各地。他遣开侍从，到乡下和百姓聊天。他看到王安石变法的遗祸，大地充满青翠的麦田，许多农舍却空空如也——农民最怕丰年，因为当地官吏和士兵会来逼他们还贷款的本金与利息，抓他们下狱。苏轼到达扬州，曾上表说“丰凶皆病”，老百姓在凶年的饥馑和丰年的牢狱之灾中进退不得。

经过苏轼的多次努力，他的建议部分被朝廷采纳。

元熹八年（1093 年）秋天，有两个女人先后去世，一个

是苏轼的续妻王闰之，一个是太后。她们去世后不久，苏轼的命运开始全面转变。八月一日苏夫人去世，九月三日太后驾崩。苏轼夫人死时，他的福祿达到最高峰，她死得恰是时候，不必陪他度过一生最悲惨的岁月。苏轼由扬州回京，先后当了两个月的兵部尚书，十个月的礼部尚书；他弟弟官拜门下侍郎。苏夫人曾陪皇后祭拜皇陵，享受贵妇一切的荣宠。苏轼的孩子们都已娶亲，留在母亲身边。苏迈三十四岁，苏迨二十三岁，苏过二十一岁。次子娶了欧阳修的孙女。苏夫人的葬礼非常隆重，她的棺木放在京城西郊的一座佛寺中，十年后，他们夫妻合葬在一起。苏轼为夫人写的祭文措辞恰当，古雅质朴，文中说她是贤妻良母，待妻的儿子如同己出。他说她分享他一生的起伏荣辱，心满意足，希望自己将来要和她葬在同一墓穴。百日之后，苏轼请名家李公麟画了一张十菩萨像，祭献给她，还叫和尚做法事，保佑她平安升入极乐世界。

太后——神宗的母亲，哲宗的祖母倒真是苏轼的守护神，她一死苏轼马上倒霉，她摄政时的其他大官也一一遭殃。贤明的老太后早就感到政风将变，因为孙子在她身边成长，她太了解他了。哲宗是个爱好文艺的少年，其他方面处事轻率，脾气暴躁，容易被老奸巨滑的小人所支配。他对祖母怀有恶感，可能是王安石的党徒故意挑拨的。

太后死前十天，范纯仁和苏辙等六位大臣前去探病。范纯仁是名臣范仲淹之子。

“我大概无法复原了”，太后说，“不能长期看着你们。你们要尽力侍候小皇帝。”

大臣即将告退，太后指名要范纯仁留下来，于是哲宗叫别人退开，只剩下范纯仁和吕大防。

朝中传闻太后谋反，要立自己的儿子为帝，太后问道：“皇上年幼，神宗委托老身治国。九年里你们可曾看到我特别照顾娘家？”

“没有，”吕大防说，“太后未曾厚待娘家，一切都是以国家社稷为重的。”

“正是如此，”太后含泪说，“所以老身临死才见不到自己的儿子和女儿。”太后并没派儿子在京做官。

“太后必能康复，”吕大防说，“请听从医生的劝告。您现在不该说这些事情。”

“不，”太后说，“今天当着你们的面，我要对皇帝说几句话。我知道我死后会有一些大臣愚弄他——孙子，你该当心！”她转向吕大防和范纯仁说，“在我死后，你们还是辞官归隐吧。我认为皇帝会任用一批新人的。”

她问侍从宫中有没有请大臣吃饭，她对吕大防和范纯仁说：“现在去用餐吧。明年此日，请记住老身。”

太后至死，苏轼就奉调离京。他自己请调，被派到最麻烦的区域，统领河北西部的军区，担任步兵和骑兵领帅，衙门在北平附近的定州（今定县）。根据宋朝体制，军事将领都是文官，由将军担任副职。苏轼任期不长，却证明诗画家也可以指挥军队。军政腐败，士兵薪饷低，衣服破，伙食差，军营一踏糊涂，贪风很盛，军纪松弛，官兵酗酒赌博，样样都来。这种军队是无法临战的。苏轼着手修营房、整纪律，将贪污的官吏革职议罪，改善军人服装和伙食。

太后去世后的第二年，哲宗改年号为“绍圣”。绍圣元年（1094年）四月，章惇为相。

章惇曾是苏轼的好友，王安石当政期间，正派学者大都因抗议而去职，章惇却一步一步往上升。他拜相后，马上把老党徒扶回高位，这些都是不简单的人物，都以残忍、奸诈而知名。

太后摄政期间，章惇曾被监禁，如今，他开始疯狂报复。王安石当年罢黜反对派，与这回第二次迫害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司马光和吕公著已死，他们在坟墓里也不得安宁，死者两次被削去封号和官衔。这样还不够，章惇又劝皇帝挖司马光的坟墓，打烂棺材，鞭尸示众，以警告所有不忠的臣民，幸亏他没有如意，否则司马光的墓就将不复存在了。

章惇拜相后，他的巨斧首先落在苏轼的身上。苏轼最先被贬到广东高山南部，通称为“大庾岭外”的地区，他被削去官职，调任英州（今广东英德）太守。苏轼察觉到眼前的变化，但他并没有去考虑这一次问题会严重到什么程度。太后去世时，他即将到定州任职，当时皇帝不许他上殿辞行，他已预感到事态严重。八年来他断断续续教过小皇帝，十分了解皇帝为人，但是他并不明白以后的命运，贬到英州当太守并不特别辛苦。

他的罪名一再重复的老调子，不外乎“诽谤先帝”，证据是元熈年间他所拟的王安石亲党的解职令。

现在苏轼由华北动身，要走一千多里地到岭南。他一生东飘西荡，这一次，不过是又一次起程。他年届五十九岁，看过了太多荣辱起伏，已不会轻易被新局面吓倒。

苏辙此时在汝州任职。他是绍圣元年（1094年）三月被贬的，几个月后，又奉调转往高安。汝州离京师很近，苏轼先去向弟弟争取财政的支援。苏轼不善理财，太后摄政九年间他官运不错，但他一直调来调去，几乎没有积蓄；另一方面苏辙不断升迁，最后当上“宰相”。苏轼去汝州，苏辙给了他七千缗供其家在宜兴定居。苏轼从苏辙居处回来，发现他的官阶又降了一次，英州的派令倒没有更改。苏轼上书请愿，希望皇帝同意他坐船走，算是对老师的一项恩赐，他担心走千余里的陆路，自己会病死在路边。皇帝批准了他的请求，苏轼把全家——包括三个儿媳妇送去宜兴湖泊区的苏宅，只带侍妾朝云和两个小儿子同行。

他们在南京对岸的仪真休息，已经是六月了。迫害元祐学者的举动达到高潮，已有三十多位大官遭到流放。苏轼第三次遭贬，他不再任太守，被改派到广州东面的惠州（今广东惠阳）担任建昌军司马，不得签书公事。苏轼把次子苏迨也遣回宜兴，只带幼子苏过、朝云和两名老女佣同行。苏轼门生张耒当时在靖江担任太守，派了两名老兵一路侍候他。

苏轼乘船而行，船到九江以南的鄱阳湖，又传来第四次贬官的诏书。这一次，又免去苏轼的建昌军司马职务，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仍于惠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苏轼在几月之内，竟被几次追贬，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

绍圣元年（1094年）十月二日，苏轼抵达惠州。他先后两次寓居合江楼和嘉佑寺，后于白鹤观自营新居。

归朝欢
和苏坚伯固

我梦扁舟浮震泽，
雪浪摇空千顷白。
觉来满眼是庐山，
倚天无数开青壁。
此生长接淦，
与君同是江南客。
梦中游、觉来清赏，
同作飞梭掷。

明日西风还挂席，
唱我新诗泪沾臆。
灵均去后楚山空，
澧阳兰芷无颜色。
君才如梦得，
武陵更在西南极。
《竹枝词》、莫徕新唱，
谁谓古今隔。

苏轼被贬途中，路遇阔别多年的老友苏坚（伯固），当时苏坚被命赴澧阳（今湖南澧县）任所，客中相遇，行脚匆匆，泣别之际，苏轼作此词以赠。

暮年远别，令人黯然销魂，但此词气象宏阔，情致高健，

堪称苏轼离别词的代表。

苏轼在惠州一住三年，对所遇的一切都淡然处之毫不为意。和他共处的人，无论贤愚，都能得到他的欢心。

惠州属亚热带地区，两条河由北面流过来，在城东会合。开始太守招待苏轼住在官舍里，他站在两河交会口的“合江楼”上，看见大江流过城市，对岸归善县的山城立在陡坡上。大小石头林立岸边，悠闲的百姓正在钓鱼。正北是罗浮和象头山。

苏轼为对岸松风亭所写的短记最能表达他的人生观。他搬到嘉佑寺之后，常常逗留在山顶的小亭里，有一天他正要回家，看到他家高高出现在树顶，路程颇远，双腿顿感疲倦万分。他转念一想，“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由是心若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若人悟此，当凭么时也不妨熟歇。”

他又恢复了自然的本性，他写信给朋友说，他来了半年，已适应该地的气候，心中无忧无虑。

行香子

清夜无尘，月色如银。
酒斟时、须满十分。
浮名浮利，虚苦劳神。
叹隙中驹，石中火，
梦中身。

虽抱文章，开口谁亲。

且陶陶、乐尽天真。
几时归去，作个闲人。
对一张琴，一壶酒，
一溪云。

苏轼向往的生活，便是“作个闲人”，现在他终于可以这样。

黄州老友陈瓘写信说要来看他，由汉口到惠州很远，苏轼回了陈瓘一封信：

“到惠将半年，风土食物不恶，吏民相待甚厚。孔子云‘虽蛮貊之邦行矣’；岂欺我哉。自失官后，便觉三山跬步，云汉咫尺，此未易遽言也。所以云云者，欲季常安心家居，勿轻出入。老劣不烦过虑……亦莫遣人来，彼此须髯如戟，莫作儿女态也……长子迈作吏，颇有父风。二子作诗骚殊胜，咄咄皆有跨灶之兴。想季常读此，捧腹绝倒也。今日游白水佛迹，山上布水三十仞。雷辊电散，未易名状，大略如项羽破章邯时也。自山中归来，灯下裁答，信笔而书，低尽乃已。三月四日（1095年）。 ”

惠州邻近地区的官员都把握良机来结交这位名诗人。惠州东、西、北面五区的太守不断送酒菜给他，惠州太守詹范和博罗县令林咽成为他最亲密的好友。其他好友和杭州和尚参寥经常派信差带礼物、药品和信件给他。苏州有一位姓卓的佛教信徒特地步行七百里，由湖泊区带来苏家子女和亲朋的音讯。苏轼的两个儿子住在宜兴，一直没得到父亲的消息，十分挂念，卓契得知后，说：“这其实很简单嘛！惠州又不是

天上，你一直走，总会到的。”于是他长途跋涉，翻山越岭，到惠州找到苏轼，抵达惠州时面孔晒黑，双脚也起茧了。

另一位苏轼故乡的道士陆惟忠跋涉两千里来看他。苏轼发现了一种新酒“桂酒”，他说是天神的甘露，他开玩笑写信给陆惟忠说，单单桂酒便值两千里跋涉的辛劳代价，陆惟忠就来了。

有时候太守詹范会领厨师带酒菜到苏轼家吃一顿；有时候苏轼会邀朋友在城西的湖上喝两盅。大湖位在山脚下，旁边有一个大亭台和两座寺庙。偶尔苏轼会去钓鱼，坐在河边的大圆石上，钓到鱼后，他可能会把鱼带去太守家吃。苏轼常到白水山游玩，有时候和儿子去，有时候陪太守或新来本地的客人。

苏轼到惠州后，发现此地每一家都会自己酿酒。他喝到第一口蜜柑酒时，就觉得自己仿佛在遥远的边区找到了真正的友伴。他给朋友的信中一再赞美本地的酒香不凡，微甜而不腻，使人精力充沛，红光满面。他曾写诗大夸这种酒，说人喝多了觉得飘然欲仙，可以飞天涉水。他学了酿酒的秘方，刻石为记，藏在罗浮铁桥下。

苏轼至少写了五六篇酒赋。他写了一篇酒颂，就是不解杯中乐趣的人，读到他描写半痴半醉的幸福状态也会为之入迷。

浊醪有妙理赋

酒勿嫌浊，人当取醇。失忧心于昨梦，信妙理之凝神……仔人之生，以酒为命。常因既醉之适，人

识此心之正。稻米无知，岂解穷理。麴蘖有毒，安能发性，乃知神物之自然，盖与天工而相并。得时行道，我则师齐相之饮醇。远害全身，我则学徐公之中圣。湛若秋露，穆如春风。疑宿云之解驳，漏朝日之嗽红。初体栗之失去，旋眼花之扫空……兀尔坐忘，浩然天纵。如如不动而体无碍；了了常知而心不用。座中客满，惟忧百榼之空。身后名轻，但觉一杯之重。今夫明月之珠，不可以襦；夜光之璧，不可以哺。刍肉饱我而不我觉，布帛袄我而不我娱。惟此君独游万物之表，盖天下不可一日而无。在醉常醒，孰是狂人之乐。得意忘味，始知至道之腴。

苏轼还自己造酒。他在定州任职数月，曾试造过蜜柑酒和松酒。到惠州，他酿过桂酒和米酒。

苏轼刚刚到惠州不久，便接到一个令人担忧的消息。自从他姐姐去世，他父亲和姐夫一家绝交，他们兄弟四十二年没有和姐夫程之才说过一句话，写过一封信，不过他们和程家其他的儿子倒有书信来往。章惇得知这个怨隙，就派程之才到南方担任提刑，处理重大的诉讼和上诉的案子。程之才绍圣二年（1095年）一月抵达广州，那时苏轼刚来三四个月。苏轼不知道程之才是不是有心忘却前嫌，他透过一位朋友送了一封正式的拜函给程之才，得知程之才三月要到惠州。为了不出错，他派苏过带一封信去接程之才，说自己“杜门自屏，省躬念咎”。此时程之才已年届六十，他也很想弥补过去的争端，和这位出名的亲戚重修旧好。程之才曾要求他为祖

先写一篇短传，那人就是苏轼的外曾祖父。也许血浓于水，也许整个眉州都以大诗人为荣，程之才也分享了这种心境，从此他们的关系日渐真诚，彼此互寄了不少书信和诗篇，后来苏轼还求助于他。

现在程之才的友谊变成苏轼替惠州百姓谋福利的手段。他虽无权签署公文，却充分利用他对程之才的影响。他早已告别高级政坛，却不能不管邻居和城中百姓的福利。如果有什么不妥，苏轼又有力量纠正，他就不能坐视不管。绍圣三年（1096年）大年初一，博罗发生大火，全城都烧毁了。要放粮救济灾民，建立暂时的居所，防止有人抢劫。衙门全毁，需要重建。苏轼积习又出现，他见政府为重建而乘机剥削人民，地方政府强征物力和民力，便设法叫程之才通令地方政府，维持市场的货源，不许强征民贷。他说，否则“害民又甚于火矣。”

他也开始关心本城的改善工作。他性爱建筑，曾与程之才和太守、县令商量，建了两座桥，一条横越大江，一条横越惠州的湖泊。建桥的时候，苏辙的太太捐出一大堆朝廷当年送她的金币。从事这项工作期间，他还做了一件百姓感激的事情，就是建一个大冢，重新安葬无主的孤骨。骨骸安置好之后，他为这些不知名的死者写了一篇祭文。他相信这些尸骨不是百姓就是军人，他遗憾有些骨骸不完整，他只好通通放入大冢内，但是他希望这些灵魂们能和平共处。他还在城西的湖泊附近建了一个放生池，这个放生池成为有名的“苏东坡放生池”。

苏轼失去权位，又是当权者的眼中钉，早已没有了年轻

时“责君至善”或改变衰国命运的野心。他不能做公仆，却可以做一个关心公务的百姓。省城广州离惠州不远，太守王古是苏轼的朋友。苏轼得知广州常发生瘟疫，就写信建议王古设一个基金来建立公立医院，学他在杭州的办法。广州人也像杭州人一样，饮水不洁，是该城疫病的主因之一，苏轼想法解决了这一难题。

苏轼到惠州，带去了侍妾朝云，他在惠州的故事无法离开朝云。苏轼去世后，白鹤峰的居所被人辟为“朝云堂”。

王朝云是杭州人。苏轼第一次谪居返京途中，她的儿子在襁褓中去世，使旅途平添了不少辛酸。后来她一直跟着他，如今又陪他再度流放。秦观曾写诗说她美如春园，眼如晨曦。她还年轻，到惠州那年只有三十一岁。苏轼已年届五十七，但是白发红颜，情深依旧。她聪明、愉快、活泼、有灵气，苏轼一生所遇的女人中，她似乎最能了解他。她敬仰这位大诗人，精神上尽量和丈夫达到同一境界，苏轼晚年有朝云相伴谪居，不但写下他满心的感谢，还写诗赞美她，把彼此的热情化为共寻不朽的友谊。

苏轼常把朝云比做“天女维摩”，他到惠州那年，曾写两首诗词给朝云，恋爱情操与宗教情操交织在一起，十分出色。第一首诗是他抵达惠州两周内写的，称赞她不像白居易的侍妾小蛮离开年迈的主公，倒像通德终生陪伴伶玄。激情的升华在下一首词中更加明显：

白发苍颜，正是维摩境界空，
方丈散花何碍。

朱唇箸点，更髻鬟生采。
这些个千生万生，
只在好事心肠，著人情态。
闲窗下敛云凝黛。
明朝端午，待学纫兰为佩。
寻一首好诗，要书裙带。

朝云对道家长生术也很感兴趣。到了惠州，苏轼的书房以“思无邪斋”命名。学者选择书斋的名字通常都用一两个字表现他的人生观，如今苏轼不但信仰简朴的生活和无邪的思想，而且相信“思无邪”是简朴生活的基础。

苏轼一到惠州就说要在此处安居，另一方面他又不知道自己下一步会被贬到什么地方。若要一直住在惠州，他就先造一栋房子，叫子孙由宜兴搬来。绍圣二年（1095年）九月皇室祭告先祖，照例要大赦天下，那年快到年尾他才知道元祐大臣都不在特赦之列。这道消息至少有安神的效果，使他定下心来。他写信给程之才说：“某睹近事，已绝北归之望。然心中甚安之，未话妙理达观。但譬好原是惠州秀才，累举不第，有何不可。”对曹辅司勋则写道：“近报有永不叙复旨挥。正坐稳处，亦且任运也。现今全是一行脚僧，但吃些酒肉尔。”

既然一切都确定了，他决心建一栋房子。那年下半年他写了一封长信给王巩：

“某到此八月，独与幼子三庖者来。凡百不失所，某既绝此弃绝世故，身心俱安。小儿亦超然物外。非此父不生此子，

呵呵。子由不住得书，极自适，余无足道者。南北去住定有命，此心亦不念归。明年筑室作惠州人也。”

第二年三月，苏轼开始在河东一座四丈高的小丘顶建筑房屋，离归善城墙很近。经过长期的战争和灾荒，这栋房子至今仍在，称“朝云堂”，苏轼作品中叫“白鹤居”，能看见河流北面转向东北的美丽风光。

苏轼的“思无邪斋”立在白鹤峰上，另一个厅堂名叫“德有邻堂”，名字取自孔子的话，“德不孤，必有邻。”

绍圣二年（1095年）七月五日，苏轼的新居正要完成时，朝云却不幸患瘟疫去世。苏轼的儿子苏过外出搬运木材，她直到八月三日才下葬。她是虔诚的佛教徒，临死还念着《金刚经》的一道偈语：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根据她的遗嘱，苏轼将她安葬在城西丰湖边的山脚下，靠近一座亭台和几间佛寺。墓后有山溪瀑布流入湖中，坟墓设在幽静的地点，山坡级级下降，有如衣上的皱纹。正后方是一片大松林，站在墓边可以看见小塔顶立在西面山脊彼端，左右两边都是佛寺，傍晚的钟声和松林的轻唱隐隐约约。附近各庙的和尚筹钱在墓顶建了一座亭阁来纪念她，叫六如亭。

苏轼爱朝云，为她作了情深意切的墓志铭，她死后他还写了一诗一词来悼念她。《悼朝云》中遗憾她的孩子夭折，时光无情，往事不再，他只能以小乘禅经来送她。她来世间也许是补偿前债，一眨眼她就去了，说不定来生比现在好得多。

以前苏轼曾写过三首诗描写松风亭附近的两棵梅树，充

分表现了他的才华。那年十月梅花又开了，他再度咏梅，以月光下的白梅来象征墓里的朝云。

西江月

玉骨哪愁瘴雾，冰肌自有仙风。
海仙时遣探芳丛，
倒挂绿毛幺凤。

素面常嫌粉浣，洗妆不褪唇红。
高情已逐晓云空，
不与梨花同梦。

丰湖是苏轼最喜欢的聚宴场所，朝云死后他不忍再去。

从此苏轼就鰥居到老。次年二月新居落成，苏迈带着苏过和自己的眷属来到惠州，次子苏迨一家留在宜兴，因为苏轼对他期望颇高，希望他准备赶考。两对儿媳共有三个孩子，两个是苏迈的，一个是苏过的。

苏轼自以为晚年可以定居惠州，没想到突然被贬到海外。新居落成两个月，移居海南岛的命令就来了。有记载说，他写了两行诗描述他在春风中小睡，聆听屋后庙院钟声的情景。章惇读到这段诗，就说：“原来苏东坡那么舒服惬意。”于是颁布了移居的命令。

绍圣四年（1097年）四月，章惇等再贬苏轼为琼州（今海南省海口市）别驾，昌化军（治所在儋州，即今儋县）安

置，不得签书公事。谁也不知道苏轼要被流放多久，他已经六十二岁，也许不能活着回京师了。

两个儿子陪他到广州，苏迈在河岸上向他告别，苏过则把妻子留在惠州，陪苏轼去海南岛去。要到目的地，苏轼必须上溯西江，走几百里到现在广西的梧州，然后南行到雷州半岛渡海。

五月十一日，苏轼在离梧州不远的藤州（今广西省藤县）与苏辙相会，六月五日兄弟二仙到雷州（今广东海康）。雷州是苏辙的贬所。

六月十一日，苏轼不得不离去，苏辙陪他去海边登船。临别前夕兄弟俩和儿子们在船上过夜。苏轼痔疮复发，十分痛楚，苏辙劝他戒酒。他们相对吟诗，这次离别很悲哀，他们也许再也见不到面了。

临行前苏轼曾写信给朋友，“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仍留手疏与诸子，死即葬于海外，生不契棺，死不扶柩，此亦东坡之家风也。”

七月二日苏轼抵达儋州。这个小岛简直不堪一住，气候潮湿，夏天闷热，冬天有浓雾，秋雨期间什么都发霉。苏轼曾在床柱上见到过一大堆死白蚁。“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这是真正的贬居。苏轼的身体已经很糟，但他不屈的灵魂和人生观不容许他失去生活的乐趣。他在一封信中说：“尚有此身付与造物者，听其运转流行坎止无不可者。故人知之，免忧热。”

章惇和苏轼其他的敌人对他无可奈何，十分生气。元符

元年（1098年）九月十二日，苏轼的日记则谈到自己的困境。

“吾始至南海，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也’。已而思之：天地在积水中，九洲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譬如注水于地，小草浮其上，一蚁抱草叶求活。已而水干，遇他蚁而泣曰：‘不意尚能相见尔’。小蚁岂知瞬间竟得全哉？思及此事甚妙。与诸友人小饮后记之。”

苏轼贬居儋州近三年时间，苏过一直陪伴在他身边。苏过是父亲各方面的良伴，他不但做一切杂事，而且担任苏轼的“秘书”。在父亲的教导下，苏过很快成为诗人和画家，他的文学作品流传至今。

在岛上，苏轼同样结交朋友，和和尚开玩笑，他还制墨，采药。除此以外，在儿子协助下，苏轼收集各种杂记，编成《志林集》。当年苏轼兄弟分注五经，苏轼担任两种，谪居黄州期间他已完成《易传》和《论语说》，如今在海南岛他又完成了《书传》。最杰出的成就是一百二十四首“和陶诗”，他在颍州就开始和这些诗，直到贬居惠州，被迫闲居乡下，他发现自己的生活几乎和陶潜一模一样，他又完成一百余首，到海南后，他完成了最后九首和陶诗。苏轼一生景仰陶渊明，他曾说：“然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

贬居儋州期间，苏轼仍有大量诗词文问世。元符二年（1099年）立春时节，他曾作一词。

减字木兰花

立春

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
便丐春工，染得桃花似肉红。

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
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

苏轼为海南春色所感发，一气贯注地写下这首词，自然真切，朴实感人。

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九日，哲宗驾崩，年仅二十四岁。他父亲神宗有十四个儿子，他只有一个“刘美人”所生的小孩，幼年就夭亡了。哲宗的弟弟徽宗继位，他日后留下三十一个儿子，几幅好画，和一个混乱的邦国。哥哥的暴政，徽宗继续施行，他任用同一批人，遵守同样的政策。不过，徽宗赵佶即位的前几个月，由新太后（神宗皇后）摄政。那年四月，韩忠彦、李清臣为相，起复元祐诸臣。七月太后还政给儿子，却一直庇护元祐党人，直到次年元月她去世为止。她活着的时候，流放的学者都获赦升官。

苏轼又开始东飘西荡的生活。五月，他由儋州内移廉州（今广西合浦）安置，刚过海到雷州一个月，又奉诏授舒州（今安徽安庆）团练副使，永州（今湖南零陵）安置。四个月内他一再换路前往永州，走到半路，终于收到随处定居的许可——如果一开始就获准自由定居，苏氏兄弟就可以轻易在广州会合，一起北上。苏辙被派到湖南洞庭湖边的一个地区。当时苏轼奉调到海南岛对岸，离广州很远，苏辙匆匆带家人北上，他们本来住在苏轼惠州的寓所。他走到汉口附近，官

位升迁，获准自由居住，于是他回颖昌去，那儿有一处田庄，其他的子女都住在该地。苏轼收到移居湖南的命令，就随儿子由廉州北上，往梧州进发，叫其他的孩子来接他。到了那儿，发现子孙还没有来，而且贺江水浅，很难直接北上湖南，他决定绕路，先回广州，再穿过北面的水脊，由江西到湖南去。

十月苏轼抵达广州，与子孙家人团聚。次子苏迨也由北方赶来看父亲。十一月苏轼途经英州，得旨复朝奉郎，提举成都玉局观，在外州军任便居住。十二月苏轼至韶州（今广东韶关市西南）度岁。

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正月苏轼穿过大庾岭，在山北的赣县停留了七十天。他等船来载一大家人，但是好几个小孩生病，有六个仆人得瘟疫死去。四月苏轼过豫章（今江西南昌），入庐山，五月到了南京。他曾写信给好友钱世雄，要他在常州代寻一间房舍，但他也想和弟弟同住，只是家中人口众多，苏辙的居处有限，他怕太过打扰。最后苏轼决定与弟弟为邻，他在南京渡江，叫苏迈和苏迨到常州清理家务，然后到仪征会合，再去颖昌（今河南省许昌市东）与弟弟同住。

不过该年一月太后去世，此时已是五月，由一切迹象看来，政风会转回原状。苏轼怕麻烦再起，不愿居住在离京师太近的地方，于是苏轼决定最终定居常州。六月十一日，苏轼由仪征出发，过长江，经镇江，取道运河，于六月十五日到达常州。

在南京时，苏轼已经患病，到常州后他的病势转剧，仅

一个多月后，七月二十八日，苏轼在常州病逝，终年六十六岁。

苏轼和弟弟苏辙，从小以父亲苏洵为师，学习写文章，以后应该说是得之于自然了。他曾经说：“写文章就好比行云流水，开始的时候没有规定的目标，常常是当自己感到有话要说的时候，就应当不停顿地写下去，到了无话可说的时候，就应当立即停止。”虽然是嬉笑怒骂的文辞，他都可以写出来、背出来。苏轼文章的格局雄浑浩瀚、光芒四射、雄视百代，可说是自文章以来，很少见到的！苏洵晚年读《易经》，作《易传》未完成，就命令苏轼完成他的遗愿。苏轼写成了《易传》，又定了《论语说》；后来住在海南，写了《书传》；又有《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诗》四卷。后来名闻一时的文人如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耒、陈师道，当他们还没有被社会上的人们所了解的时候，苏轼对待他们却犹如朋辈，从来没有以师辈自居。

苏轼自从成了举人到作为出入皇宫的侍从，一直把爱护君王作为臣的根本，忠言规劝，正直敢言，挺挺大节，朝中群臣没有一个能出其上。但是被小人妒忌、中伤、排挤，使他不能安于朝廷之上。

宋高宗即位，追赠苏轼为资政殿学士，把他的孙子苏符封为礼部尚书；又把他的文章置放在御案左右，读着这些文章就整天忘记了疲倦，赞美他是文章的宗师，亲自写了集赞，赠给他的曾孙苏峤；又推崇追赠苏轼为太师，谥为“文忠”。苏轼有三个儿子：苏迈、苏迨、苏过，都善于写文章。

苏迈，是驾部员外郎。苏迨是承务郎。

苏过，字叔党。在苏轼做杭州太守的时候，苏过十九岁，那年，他从两浙路发解参与诗赋考试，但经礼部考试却没被录取。等到苏轼做兵部尚书，苏过担任右承务郎。在苏轼统兵定武，贬谪英州，又贬惠州，迁儋耳，以后又不断徙移廉州、永州的这段时间中，只有苏过独自一个侍奉苏轼。凡是白天夜晚冬天夏天生活中所需要的一切，苏过都一身百为，从不感到为难。初到海上，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志隐》，苏轼看了以后说：“我可以在这个海岛的夷人中安定下来了。”因此让苏过写作《孔子弟子别传》。苏轼在常州去世，苏过将父亲葬在汝州（今河南临汝）郟城小峨眉山，以后在颖昌（今河南许昌）住了下来，在湖的南面种了几亩竹子，名为小斜川，自号“斜川居士”。死的时候，五十二岁。

苏过一开始是太原府税监，后来为颖昌府鄆城县（今属河南）县令，都是因为法令罢了官。晚年权通判中山府。有《斜川集》二十卷。他的《思子台赋》、《飓风赋》很早就在社会上流传。当时人们称苏过为“小坡”，因为时人把苏轼称为“大坡”。苏过的叔父苏辙经常称赞苏过能尽孝道，把他作为榜样去教导宗族中的子弟。苏辙说：“我哥哥远住在海上，就培养了这个孩子是能写文章的。”苏过有七个儿子：苏籥、苏籀、苏节、苏箴、苏笈、苏笛、苏箴。